

灾荒，饥饿，南方孤儿面临死亡威胁……

讲的是普通人的故事
真实感人 催人泪下

乌兰夫与三千孤儿

在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生活在上海和江苏、浙江、安徽一些城市中孤儿院里的数千孤儿，由于饥饿营养不良，又因其幼小缺乏抵抗能力，而面临疾病和死亡的严重威胁！



母亲的爱和汗水，使孤儿不孤，成长成材，在茫茫草原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蒙古草原敞开博大胸怀，牧民喜迎新的一代……

乌兰夫心系三千孤儿的命运安危……

乌兰夫与三千孤儿

郝玉峰

1959年，水、旱、虫、雹一齐向神州大地袭来，加上其他原因，整个中国陷入了自然灾害的深渊，城乡的粮食和食品供应严重缺乏。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区几十个孤儿院里的三千名孤儿，因为食品不足，严重营养不良，患病者很多，夭亡者时有发生。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这些孤儿院的领导者纷纷向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告急，请求中央帮助解决这一困难。康克清认为保证这些孤儿能够健康成长，是关系培养革命后代的大事，她问朱老总这件事怎么办好？朱老总说：“这还是请示一下周恩来同志吧。”于是康克清就把拯救三千名孤儿的问题直接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请示怎么办。

周恩来听过汇报后，长时间凝思无语，心情十分沉重。眼巴巴地看着这么多孤儿挨饿，他这个当总理的心里怎么能平静？康克清建议从少数民族地区调一些奶粉，以解孤儿的燃眉之急。她的一句话提醒了周恩来，使他立刻想起了乌兰夫。他说：“康大姐，请你直接与乌兰夫商量，看看他能否有办法从内蒙古调些奶粉过去。乌兰夫可是解决困难的能手啊！”

康克清正准备起身去内蒙古，碰巧乌兰夫到北京开会来了。

康克清在北京饭店找到了乌兰夫，说明了来意。乌兰夫见康克清亲自来求援，说明实在有困难，按理按情都不能不管。但是，那时内蒙古牧业遭受了特大灾害，不少乳品厂都停产了，奶粉也是很匮乏，因此在当时也就无法答复此事，便说：“康大姐，这件事我回内蒙古后想想办法，不管怎样也得帮助这些孤儿度过难关。”

康克清听了脸上出现了一丝笑容，说道：“那就麻烦乌兰夫同志了，我等待着你的好消息。”

乌兰夫开完会返回呼和浩特后，将此事告诉了奎璧、杨植霖、王铎、吉雅泰等内蒙古党委领导同志，并说：“康大姐求上门来，我们总得想点办法呀！”

他立即召开内蒙古党委常委会，研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时，一致认为现在就可以调去些奶粉，但这也只能解决一时困难，还得想个长久之计才好。

吉雅泰坐在那里一直没说话，他思忖半天才开口：“我倒有个办法，不知能否行得通？”

乌兰夫急切地问：“你有甚好主意快讲嘛！”

吉雅泰说：“我建议把这些孤儿都接到内蒙古来，分配给牧民去抚养。”

乌兰夫用手一拍桌子，说：“咱们想到一块了！由于历史上牧区性病泛滥，造成了牧民缺儿少女，非常喜欢小孩，如果把这些孤儿送给他们抚养，既可以减去上海等地区的负担，又可以解决牧民缺儿少女问题，对将来牧区发展建设也大有好处嘛！”

大家也认为这个办法很好。乌兰夫皱了好多天的眉头，顿时舒展开了。他马上给康克清打电话，告诉他这个解决办法。康克清听了十分高兴，心里很佩服乌兰夫这种高尚风格。

乌兰夫考虑问题是很细致的。他想到，虽然大家都同意这个解决办法，但这样做会使大部分孤儿将来都变成蒙古族的后代，这是否有碍民族政策呢？想到这，他又直接打电话请示周恩来。周恩来在电话中说：“康大姐已经把你的安排办法同我讲了。你们想得很周到嘛，这是一举三得的好事情，何乐而不为呢！”接着又督促说：“上海那面很着急，每天都有孤儿患病死亡。你们最好抓紧时间，先把孤儿接管过来，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同上海的同志磋商……”

得到周恩来的应允，乌兰夫立即决定由卫生厅厅长胡尔钦、民政

厅厅长白云挂帅，组成以卫生厅副厅长朱明辉具体负责的工作机构，抽调了一批医务人员和保育人员专门负责孤儿的接运和医疗保育工作。接收孤儿准备工作全面铺开之后，乌兰夫将接收上海等城市孤儿的准备情况又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听了以后，赞扬乌兰夫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并且说：“这很好嘛。内蒙古地广人稀，特别是牧区缺少孩子，牧民又很喜欢孩子，多收养些南方孤儿帮助他们解决了燃眉之急，并且对发展牧区人口和以后的建设很有好处，符合人畜两旺的要求。但要注意把工作做好，把孩子们安排好。”

从此以后，自 1960 年到 1963 年，内蒙古各地先后接纳了三千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孤儿。这些孤儿小的只有几个月，大的也只有 7 岁，大多数面黄肌瘦，有些还在患病。乌兰夫安排工作人员把年龄大一点、身体好一些的孤儿直接送到牧区去了，对年幼患病的孤儿，则在呼和浩特、集宁、锡林浩特和包头等地设立了育婴院，对他们进行治疗，待这些病儿恢复健康以后，也都陆续送到牧区去了。

正像乌兰夫讲的那样，牧民们非常喜欢这些孩子。有的户收养一个，有的户收养两个，还有收养三个、甚至五六六个的。有的甚至从几百里外赶来领养。他们把孤儿接回自家的蒙古包，像对待亲生儿女一样，精心照料。这些蒙古族父母，用最好的牛奶或羊奶喂养他们，教他们走路，说蒙话、唱歌、跳舞、骑马、打猎，供他们上学读书……

乌兰夫每次下牧区检查工作时，都要了解这些孤儿的生活情况，还专门到海拉尔和锡林浩特育婴院看望在那里抚养的孤儿。乌兰夫嘱咐大家一定要关心、抚养好这些草原上的小主人。这些孤儿在蒙古族牧民的哺育下，一个个地健康成长。

事隔多年后，周恩来在病榻上还惦记着这三千多孤儿的命运，问乌兰夫：“你们安排在牧区抚养的那些南方孤儿，现在长大成人了吧？”

乌兰夫告诉周恩来，那些汉族孤儿在牧民的抚育下，有的当了牧民，有的当了工人，有的参军当了解放军战士，还有的当了教师、医生，有的还在念书……他们在为内蒙古的建设贡献着力量。逢年过节，他们都要带着礼品回到蒙古包去探望他们的阿爸阿妈……

周恩来听着欣慰地笑了。

30 多年过去了。乌兰夫为国分忧为民解难的这一义举，在全国各族人民中传为佳话。

（原载《名人传记》1995 年第三期）

三千孤儿落户草原的回忆

朱明辉

这是在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发生的一件动人的事迹。

1959年12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我们卫生厅正在召开厅务会议研究年终工作总结，乌兰夫来电话，让厅长胡尔钦和我马上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我们想乌兰夫一定有要紧事，不然他不会亲自打电话来的。于是，我们立即宣布休会，直接赶到内蒙古党委大院。当我们走进乌兰夫的办公室时，发现民政厅长白云已在座。乌兰夫让我俩坐下后，便开门见山说：“现在有一项紧急任务，要你们两个厅完成。”

我们一听说有紧急任务，精神立刻振奋起来，就像当年在部队接受战斗任务一样。

我们当即表态说：“乌兰夫同志，有什么任务就分配吧，我们保证完成。”

乌兰夫接着向我们交待说：现在上海、浙江、安徽、江苏等城市，大约有三千孤儿因为缺乏食品、营养不良，正在遭受疾病和死亡的威胁，急需我们伸出援助之手。为这事康克清大姐在北京专门找过我，内蒙古党委经过反复研究，并请示周总理同意，决定将这批孤儿接到内蒙古来，送给牧民抚养，由你们两个厅担负这些孤儿的接收和安置工作。这可是件利国利民的政治任务，你们必须保证安全、迅速地做好。

三千孤儿的接运安置，吃、住、照料、医疗……这是一件极其复杂而繁重的工作。乌兰夫似乎心中很有数。他马上提出一个工作方案来，指示说：由民政厅和卫生厅抽调10名干部组成一个办公室，民政厅长和卫生厅长挂帅、副厅长朱明辉同志具体负责，统一领导这项工作。各盟市也要组成专门机构，在当地医院和幼儿园，腾出专用房

间和床位，抽出医护人员，担负孤儿的接收和转运治疗工作。要一级一级地切实抓好这项工作，把孤儿安全地送到牧民手里，还要教给牧民抚养方法。为了保证抚养好孤儿，民政部门要作个规定，必须是无儿无女的有抚养能力的牧民和干部才能领养……

乌兰夫对这项工作交待得如此细致、周到，使我们很受感动。更使我们钦佩的是他这种急人之所急的高尚风格。

我们临别时，乌兰夫又嘱咐说：“救灾如救火，你们回去马上把各项任务分头布置下去！”

我们从乌兰夫办公室走出来时，已是下午一点多。我们顾不上吃午饭，直接回到卫生厅，召开了紧急厅务会议，向处以上干部进行了传达。散会后，由我给各盟市的卫生部门负责人打长途电话，传达了乌兰夫同志的指示和内蒙古党委的决定，要求他们迅速行动起来，做好接收安置孤儿的各项准备工作。在我们挂电话向下布置的时候，民政厅也在向下布置此项工作。有些盟市的民政、卫生部门已互相通了气，开始联合行动起来。

自治区医院和附属医院、呼市医院，立即准备了接收孤儿的地方。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以及伊克昭盟和包头市的医院、幼儿园，都腾出房子和床位，准备了婴幼儿童的生活用品以及食品、医疗器材和药品。有些地方人手不足，还临时聘请了一些主动报名担任照料孤儿的保育员……

为什么采取这样周密的安排措施呢？这是我们有过一次教训。那是 1958 年，内蒙古从安徽省接收了 307 名婴幼儿童，将他们直接送到锡盟的东、西苏尼特旗的牧民中分散安家落户。由于这些孩子刚从南方来，一时适应不了当地的气候、环境，而牧民们也过份高兴和喜爱他们，就喂大量的新鲜牛奶。结果，因鲜牛奶含的脂肪过高，孩子们喝多了就开始腹泻拉肚子。孩子越拉越饿，牧民们就越多给他们牛

奶喝，而体内缺水，引起体内组织酸中毒，还有的因为天气冷引起感冒并发肺炎，再加上医疗措施跟不上，造成一些不良后果……

经过紧张准备，于 1960 年初，便开始了孤儿的接收安置工作。第一批孤儿近百名分别收留在内蒙古医院和呼市医院。

这期间，各盟市均反映经费不足，住房困难，医药缺乏等问题，因而接收安置工作进展缓慢。上海方面几次给内蒙古来电报电话，说他们那里的孤儿发病率越来越高，病死的越来越多，希望我们能加快接收速度。乌兰夫知道上述情况后，立即布置有关部门，从各盟市的奶粉厂先调去一些奶粉，以解上海方面的燃眉之急。那时，由于自然灾害，自治区内的奶粉厂，大多数都因缺乏原料而停产了，仅靠点库存支持城镇儿童的需要。因为营养不良，区内的大人小孩也闹起浮肿病。为了应急，只好减少区内供应，救急上海的孤儿。

乌兰夫根据接收安置工作的实际困难，在 1960 年 2 月 5 日召开的卫生和新闻部门四级干部会议上讲话时，又专门就接收安置孤儿问题提出了“各盟市要克服一切困难，做好孤儿的接收安置工作，要收一个，活一个，壮一个”的要求。

那时，内蒙古连年受灾，自治区从上到下财政情况十分困难，乌兰夫决定拨款 100 万元人民币，在各盟市或旗县所在地新建立 10 座育婴院以应接收孤儿的急需。后来又根据需要陆续拨款，充实这些育婴院的设施和购买药品。

就这样边准备、边接收，陆陆续续地有计划地接收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各城市的孤儿。有五六十名一批的，也有百多名一批的，多少不等，直接送到内蒙古各地。据当时的统计，全内蒙古有 11 个城市、37 个旗县接收安置孤儿。

据上海等城市护送孤儿的同志介绍，这些孤儿多数是被遗弃的，十分可怜。有的生下来就被丢在医院走廊的地上、丢在产房的婴儿哺

乳室里，大人却不辞而别；还有的失去父母流落街头、火车站的。他们多数患有疾病，也有少数生下来就是残废儿。他们不知道自己姓什么，更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民政部将他们一个个收留起来，放在育婴院抚养……

这些孤儿，小的只有几个月，最大的也只有七八岁。开始时，我们派医务人员和保育员到达孤儿所在城市做好准备工作，用火车单挂车厢运到内蒙。为了减少孤儿们长途运送的疲劳和抢救一些病儿，后来就改为租用飞机接运。这些被接收来的孤儿，有些原来就有病，经过长途运送，病情加重，有的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状态。我们的医疗保育人员，以高度负责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不分昼夜进行抢救护理，生怕出现差错。

我们根据乌兰夫的指示，每批孤儿到达内蒙古后，都要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年纪大点的，身体好的，在医院或育婴院休息几天，然后便直接送到牧区去，由牧民们领养。对有病的，先留在医院里进行治疗，病危的施行抢救，……待他们病愈后，再送到牧区去交给牧民。对少数残废孤儿，由牧民领养有困难，就由当地的民政部门负责雇人或放到幼儿园指定专人抚养。由于周到的安排和照顾，在接收安置中，没有一个婴幼儿死亡。

乌兰夫始终十分关心和重视接收安置孤儿的工作，三天两头打电话或找我们去询问孤儿的安置情况。在接收孤儿的初期，他听说已经有上百名孤儿来到呼市，他便亲自到内蒙古医院和呼市医院去检查对孤儿的照料情况。当他在医院看到那些骨瘦如柴、大脑袋、细脖子、大肚子的病儿时，心情很难过，反复叮咛在场的医护保育人员：“你们要千方百计地把这些病儿治好，健健康康地将他们送到牧民中去抚养。”

不仅如此，乌兰夫每次到牧区去检查工作，或者听取各盟市领导

人汇报时，他都要详细询问安置在当地的孤儿的抚养情况。1960年冬天，乌兰夫去呼伦贝尔盟视察时，正巧我也在那里检查卫生防疫工作，他让我陪他到海拉尔育婴院去看看在那里抚养的孤儿。临走的前一天，他充满感情地对我说：“老朱，咱们不能空着手去吧，要给孩子们带点礼物。”

我想还是乌兰夫同志考虑周到，便说：“乌兰夫主席想送什么礼物？我上街去买。”

他摇摇头说：“不用麻烦你了，我让秘书去买吧。”

第二天，乌兰夫带了许多饼干、奶粉、糖果等小食品，还有小汽车、小手枪、三轮小自行车等玩具，几乎把卧车都塞满了。育婴院的院长和阿姨们接到乌兰夫给孩子们礼物，深深为这位自治区最高领导人的无限爱心所感动。

乌兰夫看到一个个孤儿长的红光满面，活泼可爱，心里异常兴奋，当场表扬了育婴院工作人员的工作很出色。保育员们把乌兰夫送来的礼物分给孩子们，院长对孩子们介绍这位陌生大个子首长说：“孩子们，他就是你们的救命恩人乌兰夫爷爷。这些糖果、玩具，也都是他送给你们的。快去谢谢，向乌兰夫爷爷问好！”

孩子们一下都扑到乌兰夫身前，将他围住，喊着：“乌爷爷好！”
“乌爷爷好！”

乌兰夫抱起一个小女孩，像抱着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亲昵地吻着她那苹果似的小红脸蛋，说：“你们要听阿姨的话，每天吃好，喝好，玩好……”

那小女孩很乖，搂着乌兰夫的脖子说：“我听乌爷爷的话！”

这时，音乐老师弹起了风琴，大活动室内响起欢快悦耳的儿歌。乌兰夫兴致勃勃地拉起孩子们的小手，一边唱着儿歌，一边跳起集体舞来，玩得十分开心……

离开育婴院时，院长和保育员领着孩子们，一直将乌兰夫送出大门外……

从1960年到1963年，内蒙古共接收安置了上海、浙江、安徽、江苏等城市的孤儿三千名，其中上海约有一千八百余名，其它几个城市约一千二百名。这些孤儿接到内蒙古后，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呼伦贝尔盟、伊克昭盟又把他们送到各旗县去，由民政部门安排牧民领养。每个牧民来领养孤儿时，医务人员和保育员都要一个一个的介绍每个孤儿的身体情况，个性和习惯，交待他们抚养方法，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应当注意的事项。这样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保证孤儿能够健康成长。

1962年夏天，我去锡盟检查卫生防疫工作。我和旗领导人骑着马，在碧草如茵的大草原上巡视每个居民点的卫生状况。这天晚上，落脚在一位叫那顺巴雅尔的牧民家里。这是一座用了多年的蒙古包，但包里收拾却很干净。毛毡上有一个两岁左右的大胖小子，长得又结实又可爱。男主人到外面饮牛，女主人忙着给我们做羊肉奶子面条，我就跪在毛毡上逗小孩玩。同行者悄悄告诉我说：这个孩子就是他们家抚养的上海孤儿。我听了感到欣慰，因为我在这里看到了自己努力的成果。

吃饭时女主人抱着孩子在一旁看着我们。我说：“你这个大胖小子长得真棒呀！”

谁知这位女主人却毫不掩饰地说：“这是国家的孩子（锡盟草原上都把上海孤儿叫国家的孩子），我们俩口无儿无女，感谢乌兰夫主席，使我们有了后代！”说着她把那大胖小子抱得很紧很紧，好像怕我们抢走似的。

我问：“你这个大胖小子长大以后，你准备让他干什么？”

女主人脱口而出说：“让他上学念书，将来建设草原呗！”旗领导

人对她竖起大拇指，意思是夸她很有远见……

当我把在草原上遇到的这些事，向乌兰夫汇报时，他饶有兴趣地听着，遂满意地点着头说：“你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中央的领导同志很满意，朱老总对这件事评价很高啊。”他还说：“这不仅仅是拯救 3000 孤儿生命的问题，而是一项人道主义的伟大事业。这样的事，只有在我们这样国家才能办得到，也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听了倍受鼓舞。

接收安置孤儿工作结束后，上海等几个城市的领导同志派代表来，向内蒙古自治区赠送锦旗，表达他们的感谢之情。

在宴请上海等城市代表时，乌兰夫同志谦虚又风趣地说：“我们抚养这三千孤儿，对你们是减轻了负担和困难，而对我们却是得到了一批宝贵的财富。过上二三十年后，你们再来草原上看看，这些孤儿就是牧民的儿女，内蒙古的建设人才啦……要讲感谢，我应当代表草原上那些无儿无女的牧民们感谢你们呢……”

30 年过去了。这些在草原上落户的孤儿，都已在内蒙古生根开花，长大成人，生儿育女、繁衍后代了。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努力工作，成为草原建设的骨干，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他们的青春和才智……

每当我回忆这段不平凡的往事时，脑海里就会浮现乌兰夫同志那伟大的形象。他那高尚的风格，优秀的品德，令人钦佩不已，久久难忘。

（郝玉峰整理）

额吉和她的孩子们

——献给草原上的妈妈

乐 拓

编者按：乐拓，男，汉族，作家。他在 80 年代初，为创作反映乌兰夫与三千孤儿为题材的电视剧，深入锡林郭勒草原体验生活、收集素材，曾在抚养六个上海孤儿的张凤仙家的蒙古包里生活了两个多月。在与张凤仙相处的日子里，他不但被张凤仙夫妇含辛茹苦地抚养孤儿的事迹所感动，而且与她们全家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当年，他曾许诺将拍完的电视剧送给张凤仙看。正当他完成的六集电视剧《额吉和她的孩子们》脚本，尚未开拍之际，不幸，张凤仙却因积劳成疾，离开了人世。噩耗传来，他万分悲痛，饱含热泪写下了一篇激动人心的短文《怀念额吉》。接着，他又写了纪实文学《额吉和他的孩子们》，以慰张凤仙额吉的在天之灵。

本书收入乐拓的另外两篇文章，也都是根据他当年在草原上收集的素材写成的。

袍子上最先磨烂的是袖口，
人世间最受劳累的是妈妈。
草原上最美丽的是花儿，
人世间最疼我的是额吉。

——锡林郭勒民歌

引子

额吉，蒙语，就和汉语中的妈妈一样。

锡林郭勒草原上有六个汉族孩子，他们学着蒙古人，把自己的妈妈唤作额吉。

我去草原采访他们，问及缘由，他们说是这位额吉自幼抚育了他们，她就和我们的亲妈妈一样。我去问额吉，她只浅浅一笑说：“草原上断了奶的羊羔还给配奶哩，当妈妈的收养没娘的孩子还不是平常的事。这如同草原上的草，普普通通，不值一提。”

抬起头，从她家毡包窗口望出去，紧贴包门就是一片草地。再朝远望，草茵如潮如浪，翻涌着，一直扑打到遥远的天边。于是我想这浩瀚的草原大海不就是用一棵一棵小草缀连起来的吗？这也如同额吉对孩子们的爱，每一次的行为都可能是细小的，微不足道，不值一提。可是一位母亲，同时抚养六个孩子，数十年如一日，风风雨雨，呕心沥血。如若把这些细小的爱聚敛起来，放在一起，那不也是一片母爱的海洋吗？

我来额吉家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毡包当中牛粪火烧得正旺，炉上的奶茶，兹兹喷出热气。我觉得这座蒙古包就好像漂荡在草原大海中的一只小船，额吉不停地搅动奶茶的手像荡动的船桨，孩子们娓娓地叙述像桨下的阵阵涟漪。我和孩子们一起，享受着温馨的母爱，随着船儿划呀，划向深深的母爱的海洋。

大雁朝南方飞去 孤儿往北方走来

六十年代初，全民几乎都在挨饿。那一年天冷得早，刚刚9月草地就冷嗖嗖飘起了雪花。

一长串十字木钻轱辘勒勒车，拉车的老牛慢慢悠悠地行走在草原上。每辆车上都装有四五个儿童。他们穿着统一的蓝布衣裤，衣袖上缀一缕白布条，上写着他们的姓名，性别，年龄。几位穿白大褂的护

理人员伴车步行，随手给孩子掖紧被角，掐朵花逗孩子玩耍。有几个稍大些的孩子手扶车辕四处张望，似乎在疑问：“这是到了什么地方？”

一群大雁排成“人”字在凄凉的秋风中掠过勒勒车队，它们告别北方，飞向南方。这群孩子不知道在秋风中触景生情，更不会预测未来的命运。他们憨憨入睡，呆呆痴望，最多只能感到这里和刚刚告别的上海大不一样，处处新鲜而又奇妙。

锡林郭勒这块与异国相邻的草原确实太宽广，太神秘了。它和号称世界之最佳的加拿大草原、澳大利亚草原、蒙古国草原并称世界四大草原。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在这浩瀚的草原上过去一直疾病流行，人烟稀少，出生率低，蒙古包里经常是“只听孩子哭，不见孩子笑”。因为往往当孩子还未学会欢笑便不幸夭折。许多牧民人家像盼着一匹骏马一样盼望有一个孩子。

就像传说中的老佛爷显灵，草原上传出喜讯：一大批失去父母的上海籍孤儿要送到锡林郭勒草原安家落户，一家一个按户口分。多好呀，人民政府什么事都管，什么好事都做。

如今已经证实，最早做出这项决策的是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他从上海、北京、内蒙之间架起一座温暖的桥梁，三千多名孤儿沿着这座大桥从上海走向草原。这是一段真实的故事，这是一段让草原人民永远铭刻在心，世代相传的佳话。

“喂，快去看哟，小宝贝们来了。”

那时候草原上还没有电话，小宝贝进入大草原的喜讯却比电波传的还快。

年迈的额吉，中年的贝勒格（指中年的妇女），刚刚喝过喜酒的新比尔（新媳妇），姑娘们，小伙子们，换上新袍子，骑上花骏马，牵着骆驼，赶着牛车，带着早已缝好的小被子，花衣裤，捧着用羊犄

角做成的哺乳瓶，用彩绸缝制的玩具马，从几十里、上百里的牧业点上，犹如海上的快艇，滑翔到公社浩特来。旗民政科长宝音高高兴兴地和人打招呼，按户口登记造表，把那些又哭又闹的娃娃，一个个抱起来，亲一口再交到牧民手里。额吉们双手合十，默默念一段吉祥如意的经文，抱过小宝宝，像抱过一个神圣的小太阳。——她们的男人，也就是孩子们未来的阿巴嘎，连忙把手里的酒杯举起，将杯中白酒弹天洒地，把鲜奶子涂抹在孩子们的脑门上，祈求神灵保佑孩子长命百岁健康成长。他们亲着，笑着，把孩子抱回到自家勒勒车前，立刻举着孩子，和临近人家互相攀比，互相夸赞。有人在唱歌，有人在跳舞，有人在大口地灌一瓶烧酒，吃一只整羊。都说这是近几年少有的欢乐庆典。

黄昏时候，分得孩子的牧民人家心满意足地往回走。宝音被好几家牧民撕拽着拉进家喝酒去了。酒正酣甜，歌声才起，忽地有人来报说好几个大孩子逃跑了。宝音放下酒杯，跑出包门，跨上快马，搜索追赶。

逃走的是四个男孩、两个女孩。他们是孩子中的“高龄儿童”，最大的七岁，小的四岁，懂事了，会讲上海话了。是那个外号“猫儿”的男孩起的头，他说爬上山顶就能看见黄浦江，能看见上海的大高楼。他们手牵手一齐往上爬，到了山顶看不到大上海便放声大哭。

宝音赶上去，翻身下马，搂住大哭的孩子劝他们回家。孩子们说了一大串宝音根本听不懂的上海话。

“阿拉家在上海，勿住这种面包房子。”“勿喝咸茶，勿吃黄米。阿拉要吃白米饭。”在孩子眼睛里，这里的一切都太不合规范，和记忆中的大上海相差太远了。

记忆，本是人类智慧的储存和积累，是知识印象在头脑中的重演，是人的极为宝贵的天赋。然而对于这几个孤儿来说，过去仅有的片断

记忆，变成了他们无限的眷恋和永无休止的索求。也是他们埋藏在心底深处永远的痛苦。当那些善良的额吉笑咪咪的向他们伸出欢迎的手，他们便显出烦躁、不驯服，不肯就范于陌生人的怀抱。甚至连踢带打，使人不得近前。额吉们便说：“抱养的孩子要小，大孩子养大也不会叫额吉。”于是这六个“大龄儿童”便被挑剩下。他们也自动形成一个小帮伙。

民政科长宝音是个善骑烈性骏马的人，可对这几个咿哩哇啦的大孩子却一筹莫展。

这里是锡盟西部，连长途电话、长途汽车都不通，再无力量把他们送回上海了。可是怎么安置他们呢？冬天将到，总得有个过冬的窝呀。当时正是人民公社化时期，有人说牛马骆驼都能集体化，孩子也应集体养，办个民族幼儿园吧，说不定还会养出先进经验哩。说干就干，雷厉风行，两天后就在一栋平房外挂出块蒙汉文牌子“育红民族幼儿园”。屋里六张小床，一架火炉，院里一副能高能低的翘翘板，特聘一名汉族厨师专为孩子起小灶。

当今的中年人，对人民公社大抵都还有些记忆。在那个大而空的集体里，猪羊都难得养活，何况是几个淘气的半大孩子！首先是汉族厨师难为无米之炊。那是全民族都在挨饿的特困时期，优待孩子也只能是天天清水荞面压饴饴，吃得孩子肚儿膨膨胀，口里直冒酸水。院中的翘翘板早当柴烧了，最好的去处是郊外的喇嘛庙。在那里能偷吃佛爷的供果，能捡到画有鬼脸的莜面傀儡。没过多久孩子们都变成“活小鬼”了。

俗话说七八岁的孩子狗都嫌。这几个没遮拦的小鬼四处为“害”，和山羊顶架，同牛犊子摔跤，疯得衣服撕成片片，裤裆开花，谁见谁心疼：“这群没娘的娃真可怜！”“这群没毛的燕咋过冬哟？”

锡盟的冬天，零下40度，白毛风一刮，年年有人冻死。……

“孩子们，跟我回家吧”

“孩子们，跟我回家吧。”对于孤儿来说这是一句多么动情的呼唤！这呼唤改变了孩子的生活，也改变了孩子们的命运。

人世间形成孤儿的原因很多，疾病、瘟疫、战争、灾祸都可能出现孤儿。可是孤儿的命运、遭遇，却因各自所在的国家、社会，所处的时代而各不相同。对于这几个来到草原的孩子究竟是什么样子呢？那是谁呀，为什么会发出如此亲切的呼唤呢？

她就是本文主人公张凤仙额吉。在寒冬将至，孩子们面临危难的时候，她毅然地把六个孤儿领回到自己的家。

孩子们居住的地方，当时是一级公社（现为旗府所在地），聚居着二三十户人家。公社有座卫生院，张凤仙额吉是卫生院的护理员。她祖籍土默特左旗，父母早亡，一个亲哥抗战时随军去了延安。她是跟爷爷长大的，她自己说她从小和孤儿差不多。她丈夫仁钦·道尔基，是解放军骑兵连长，转业到锡盟镶黄旗牧场当场长。他们便定居在镶黄旗草原上。清新的空气，营养丰富的牛奶羊肉，造就了她强壮的体魄，一年四季她双颊挂着桃花般的红润。她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戴着一副宽如草叶的银耳环，洁白整齐的牙齿，常带着微笑，闪动着和耳环一样的白光。在这个浩特只有她穿着一件白大褂工作服，只有她遇见孩子总要停下脚步微笑地说话，抚摸他们散乱的头发，像早有准备似的从白大褂兜里摸出几块花红纸包的水果糖，放到孩子手里。孩子们见到她尤其温驯，像一群遇到妈妈的小鹿，压低嗓门，扣着手指头叫她：“红脸阿姨好！”（红脸阿姨是孩子们送给凤仙额吉的称谓，后来他们一直延续着叫了许多年）

晚上，仁钦·道尔基从牧场打马回家，俩人脸对脸坐在热炕上喝奶茶。

妻子说：“咱们把幼儿园孩子接回家吧？”

丈夫说：“我早知道你有这心思。我同意。你说吧，接几个回来？”

“这要看孩子愿不愿来。”

“我先说，愿意来也只能收一个，最多收俩。你不知道上级传达了文件，今年大灾，口粮奇缺，领多了那小嘴是填不饱的。”

夫妻俩把一壶奶茶都喝光了，还是没有定下来到底接几个孩子好。半夜里，一群大雁呜咽着从蒙古包顶上飞掠过去。这是一年中最后一批南归的大雁了。雁声一断，寒冬便席卷而至。

又是一个黑夜，道尔基值勤晚归，凤仙煮一壶奶茶，抓一包油炸馓子急匆匆进了幼儿院。孩子们围住她叫“红脸阿姨”。他们很香地吃牛油炸的散子，喝带咸味的奶茶，他们已经逐渐适应了牧区的生活习惯。只有一个头上生疮的男孩不敢喝茶，他说睡觉前喝茶怕尿炕。尿炕是耻辱，小哥们要体罚的。

疯跑了一天的孩子们喝罢茶倒头就睡着了。张凤仙没有走，她一个个给孩子解衣脱鞋，掖紧被角，把湿兮兮的靴子烘在炉边，又挑亮了油灯，缝补那些烂了的裤裆，磨开花的袍袖。

有人在远处拉马头琴，琴声低吟，如泣如诉，一个男人随着琴低声吟唱锡林郭勒民歌：

袍子上最先磨烂的是袖口，
人世间最受劳累的是妈妈
草原上最漂亮的是花儿，
人世间最疼我的是额吉……

随着歌声，凤仙端起油灯走近孩子身边，她要细细端详这些孩子，她要选出一个或者两个收养。

最先看到老大巴特。这是一张眉清目秀、十分英俊的脸，真如其名有几分英雄气概（后来他果然气度非凡，考入南京气象学院，毕业后现任锡林郭勒气象局气象工程师）。可惜太瘦了，就像水缸背后悄

然窜起的一根黄豆芽，缺乏泥土的营养。凤仙心想：这不得事的，接回家多加奶食牛肉，一个冬天就健壮了。

灯光下再看第二个。这就是那个可怜的不敢喝奶茶的黄头发瘦孩子（蒙古名叫阿都钦呼，小哥们嫌字太多，就以他的发色为号，戏称黄毛。长大后他以黄为姓，取名黄志钢）。人虽瘦弱，却鼻直嘴方，天庭饱满，不失男子气概。遭的是耳朵生疮，流黄水，凤仙懂得这种病很顽固，幼年不治，来日会双耳失聪形成残疾。想到这里，她决定先接回这个病孩，赶紧治病，多吃肉多喝奶茶，无非是夜里多把两次尿就成了。

第三个孩子叫玉宝。这名是孩子自取的。（从上海来内蒙的火车上，护送的阿姨给他们讲高玉宝读书的故事。那年玉宝五岁多，懂事了。他对阿姨说“我也要读书”。后来他参军入党，以党为姓，名叫党玉宝。如今他已是某部中校军官）。这孩子又白又胖，心灵手巧，凤仙打心眼里喜欢他，决心领回去。

凤仙把灯捻挑大，照着第四个男孩。这孩子又瘦又小，像个可怜的猫儿。蒙古人把这种老生儿子叫“阿特肯呼”（汉意是“老儿子”，“老疙瘩”），呼唤声中包含着十分怜爱的情意。哥几个喜欢这个小弟弟，亲昵地称他“小猫儿”。（猫、毛谐音，长大后他取姓毛，名志勇。果真志勇如泣如诉双全，参军后屡次立功，转业任旗镇武装部长）。凤仙早知道这个小崽是个淘气包，爬高登梯，打狗逗鸡，和牛犊顶架，和山羊摔跤，全都是他领的头。凤仙不嫌弃，她相信汉族中一句俗话：“闺女淘了手巧，小子淘了才好。”她心中早已几十遍地叫他“阿特肯呼”了。

她手端油灯走到炕的另一头，另一头睡着两个女娇娃。

姐姐叫其木格，粗眉大眼，圆盘脸蛋，是个憨厚朴实的姑娘。可惜满头生着黄水疮，再不治就可能变成个秃子。女娃娃没有头发怎么

行？应该赶紧抱回家治病。小妹妹名叫小高娃，白白净净，灵灵巧巧，细细嫩嫩，温文尔雅，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妹子。（她后来考入南开大学，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英文翻译）。她的胎发长长的，却乱成一团毡皮，睡梦中不时抓痒痒，那头乱发中一准是生满了咬人的虱子。

“好可怜的娃哟！都因为他们没有额吉。”她止不住热泪直流，手里的油灯颤颤发抖。她暗下决心，心里喊着：“抱回去吧，统统抱回去吧！他们都是父母所生，他们有权力、也应该和所有的孩子一样，享受到父母的疼爱，过幸福的童年。”

深夜，晴空，万籁俱寂。马头琴声不断，那个男人还在唱歌。凤仙冒着寒气跑回家。道尔基值勤归来已经入睡。她不顾一切地一把将他摇醒，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喊：

“你听着，我选好了，六个全都抱回家，明天起来你就给孩子准备吃食吧。”

第二天清晨，她早早上班，把病房工作安顿好就往公社跑。恰好旗府宝音科长从公社骑马出门，原来他昨天就和公社主任商讨，正发愁如何安置那批孤儿过冬的事。

凤仙一把拽住马缰绳说：“宝音达拉嘎（宝音首长），我想好了，我要求把六个孩子都领回家，交给我去抚养。”

宝音措手不及地问：“什么，什么？六个孩子一齐要，能行吗？”

“能行，我领回去保证他们安全过冬。我要把他们培养长大，努力教育他们成为有用之材！”

宝音翻身下马，紧紧握住凤仙的手说：“太好了，太合适了。你年轻体壮，懂得医学，你丈夫是老党员，老劳模。赛，赛，赛拜奴！（好，好，好极了）”

他们喜笑颜开地来到幼儿园。孩子们热情地围上来叫“宝音叔叔”，叫“红脸阿姨”！

凤仙说：“孩子们，我接你们一块回家去好吗？”

“好——”

“愿意跟红脸阿姨回家去吗？”宝音问。

“愿——意。”

张凤仙蹲下身子，伸开双手，白罩衣下摆摊开在平地上，像一只温驯的白天鹅。孩子们扑倒在她怀里，像一群丑小鸭。张凤仙把生疮的其木格驮在背上，抱起生虱子的高娃，牵着“阿特肯呼”小猫，背后跟着黄毛、玉宝、巴特，浩浩荡荡像一队小兵，在清晨阳光的照耀下，自由地、大踏步地行走在大草原……

艰难岁月

人们一提到草原总爱说“无边无际”。提到草原牧民的生活，总是“酥油奶皮手扒肉”，仿佛那里有取之不竭的食物。其实，牧业经济相当脆弱，你今朝是牛羊成群的“巴彦”（富户），一场白灾（暴风雪）将牛羊成群冻死、马群冲散，倾刻间就会败落成上无片瓦的“玛拉沁”（牧民）。张凤仙、道尔基收养孩子那年，草原上和全国一样都在闹饥荒，上至总理下到平民都定量供给口粮。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不会忘记的，一家人兄弟姐妹，乃至夫妻父母都在“斤斤计较”，称斤论两分而食之。那么这个新组建的、一顶蒙古包下两个民族的大家庭，该怎样度过这个艰难的岁月呢？

平日，仁钦·道尔基总爱眯缝起眼睛端详这群娃娃。他是个老兵，就爱从孩子身上常发现些当兵的事儿。他用手指弹着一个个撑得溜圆的肚儿说：“六个小兵，整整半个战斗班，要是打仗准能冲锋。”可如今不是打仗，而是要凭他这双手把六个小兵的肚儿填饱，那是要花费一些力气的。他买了一支猎枪，踩着碎雪去荒原上打兔子、追黄羊。不料，那年月当兵的也挨饿，他们整连整排地在汽车上架着机关枪、追着成千上万只的黄羊群绞杀。结果，惊恐的黄羊都逃出了国界，道

尔基已无猎物可捕。有段时间全凭牧场的“红灯笼”羊肉，（即冻饿致死的小羊羔）过生活。甚至捡回一些过去根本不屑一顾的头蹄下水货，在井边上翻洗，在炉火中烧烤。

表面上，张凤仙依然不惊不乍，依然是“早茶午饭”，满腾腾的主副食按时端上桌，不限量，不分配。眼瞅着豆芽似的巴特结实了，黄毛的耳朵不再流脓了，玉宝更白更胖，小毛敢大碗喝奶茶（夜里凤仙给他定点把尿），几个男孩睡在当院搭成的暖炕窝棚里，两个女娃一左一右睡在凤仙身边。她讨来带毒的草籽洗好了其木格头上的疮，为彻底清除高娃头上的虱子，狠狠心把一头胎毛发剃成个“光葫芦”。姑娘是朵花儿，自小害羞，凤仙给她包一方红头巾，穿一件用自己袍子改制的蒙古袍，都说她像个小喇嘛。

邻人都说：像个有娘的孩了。凤仙听罢喜忧参半。未来的冬天是相当漫长的，她已经悄悄贴补了她的全部积蓄，来日恐怕连个温饱都保不住了。

冬天终于庄严而隆重地来临了。先是大风，后是大雪，风雪阻塞住浩特（村民点），把它们分割成零星的“海上孤岛”。

这时，凤仙唯一的亲侄女挨桃子从土左旗老家来姑姑家“活命就食”，六张小嘴变成七张，更难住了做饭的张凤仙。

应当说明，旗民政科给每个孤儿都有照顾，一年两套衣裳，八块钱生活费。考虑到他们从南方来，每人每月特供五斤大米（或五斤白面）。这点细粮该咋分配呢？

有天午饭，菜是一人一碗羊骨头，饭是一人一个白面馍。发到挨桃子名下没有了。姑姑拉着她往里屋走，“快跟姑姑回里头吃肉去”。其实是一碗清汤，一块菜饼子。又一次，还是这样说，将要开饭时把挨桃子拉走，眼尖的黄毛看出端倪，追到里屋一看，见她们俩吃的是菜糊糊。黄毛落下眼泪，问道：

“阿姨，你们咋不吃馒头？”

“吃过了，吃饱了。”

黄毛把挨桃子叫到羊圈边，把自己的馒头分开一半给她，挨桃子不要：“姑姑说了，白面是你们的特供，我们不能吃。”

“你吃吧，这是哥哥我给你的。”

挨桃子扯着馒头，一点一点咽下去。她觉得这个黄毛哥哥怪可爱的。（若干年后，这一对两小无猜的孩子结为夫妻，据说和这个馒头有些关系。）

饥饿使人痛苦，但也能在饥饿中磨练人的意志，塑造人的品格。

一天清晨，草原上空一阵轰鸣，一只大蜻蜓似的直升飞机飞来飞去，盘旋着给草原“孤岛”上投粮食。这是政府发来的救济口粮。事也真巧，有一麻袋足足二百斤的大米袋子正投落到凤仙院子里。这袋粮足够她家吃一冬天。这种无数可查的空中投掷物并没有人发现落在她家。下落时袋子一角被挂破了，雪白的大米洒了一地，多诱人呀！张凤仙拿针线缝好大米袋，招呼孩子把大米抬到勒勒车上，由她驾辕，前拉后推把大米送到公社粮站。这件事长久地被人传颂，深深地镌刻在每个孩子心里。可是就在同一个冬天，同样为了一袋大米，几乎丧了几条人命！

临近春节，上级给每个孤儿特批五斤大米，领米地点却在百里之外的化德县。为了领米凤仙顶风冒雪跋涉远征。

临走前她给每人蒸下三个大窝头，说清楚是三天的口粮。道尔基大爷外出开会，家里一切全交给八九岁的巴特料理。

冰雪大风，举步维艰。凤仙凭着爱子之心，百里路程当天夜里就赶到了。第二天装好米背起来就往回赶。去时轻身顺风，还好受些；回时驮了三十斤大米，迎着刀割似的大风，每走一步都无比艰辛。如此恶劣的气候，野狼都不敢外出，她却在风雪中艰难地前行。她跌了

无数的跤，却依然顽强地站起来，向前赶路。一次，她跌进一口雪洞里，雪洞挡风避雨，显得乍暖，她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一个旋风从她头上掠过，呼啸的风声化成了孩子的呼叫声，她被惊醒了。好险呀！要是在这里睡下去，等不到天明一准会冻死！她连忙揉揉眼睛，吞下几口白雪，吃了几块随身携带的饼干，两天的风雪路，她全部的食品就是一包在县里买的“香草饼干”，此外就是那些随处可见的冰雪。但她终于走完了这条漫长的道路，走回到自家的蒙古包。

可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拥挤在包门口迎接她的只有五个孩子，另一个小的、她最娇惯的高娃却奄奄一息地躺在炕上，满脸灰青，口吐白沫，眼睛直直地张望。凤仙一见，疯一般地跑过去，抱起高娃呼叫。凭经验她知道孩子是食物中毒，连忙问：“告诉我，给她吃了什么？”

负责家务的兄长，那年还不足九岁的巴特结结巴巴地说：“她饿了，我给她吃了半碗芝麻”。

原来阿姨走了以后，孩子们早已忘了规定，三个窝头两天就吃光了，第三天一清早都喊饿。巴特和“小猫”商量，决定翻箱倒柜找出可吃的东西。

困难年月找口吃食太难了。但机灵的“小猫”还是发现了一只羊皮包，里头装有形似芝麻的草籽。其实那是俗名叫“匈芽籽”的毒草籽。是冬天的时候凤仙采来给其木格洗头疮用的。没料到善于侦察的“小猫”把它翻腾出来，偏巧这两个“小上海”对南京路上的芝麻烧饼还有点记忆，和匈草籽一样，小小的、黄黄的吃到嘴里又香又脆。他们恪守妈妈的教导，决不随便拿别人的东西，但他们又可怜高娃小妹，商量之后只取出小半碗，只给小妹一人吃。谁能知道疼爱竟成了危险的过失。小妹吃下不久便打滚痛哭，翻白眼，四肢麻木，话也说不出，哭也不会哭了。孩子们一个个吓得呆若木鸡，不知所措。恰

好这时，妈妈回来了。

妈妈抱起高娃，把食指伸到她嘴里搅动，让她连连呕吐。忽又想起还存有一把绿豆（那是挨桃子从前山带来的），立刻拿来砸烂，冲水喝是解毒良药。果真灌下绿豆水后小高娃连连呕吐，把青绿色的胆汁都呕出来了。直到这时高娃才逐渐清醒。她一头扎进凤仙的怀里，痛楚楚地呼喊：“阿婕，我再也不敢喊饿了。”

当夜，凤仙在五尺大锅里添满水，满满熬了一锅大米粥。说也奇怪，孩子们都文质彬彬的，每人喝过两碗就不要了。凤仙理解，这些孩子小小年纪已经在饥饿中懂得了谦让，学会了忍耐。

春天里的故事

漫长饥饿的冬天终于捱过去了，温暖的春风扑面而来。不过草原的春天并非是最美的季节。

凤仙挨个地抚摸孩子的脸蛋，都瘦了一圈，都长高了。她把兄妹几个都送进学堂里读书，先学蒙文，后学汉文。蒙文蒙语能使他们在草原上生活起居方便，而要掌握高深的科学技术还必须学习汉文汉语。她这个普通的蒙古妇女，却天生的懂得尊重知识，羡慕读书人。

孩子入学后，她把饭菜做得更加香甜可口。刮风下雨，她把饭菜捂在笼上，抱几把雨伞，提几双雨鞋赶到学校接她的孩子，她觉得这才是家庭，是当妈妈的一种最美好的享受。有时她去得早了，便悄然地站在教室窗外听老师讲课。她从来没有上过学校，她希望她培养的孩子能够上高中、上大学。

清晨，牧区妇女第一件事是挤奶子。她走进羊圈单腿跪下，双手揪住母羊的奶头，“吱——吱——”洁白的乳汁像箭射入奶桶。她和所有的牧区妇女一样，最爱唱人人都会的奶羊歌：

特咕——特咕——

冬天过去了哟，

草儿变绿了哟，
花脸脸母羊哟，
快亲亲你的孩子吧。

阳光普照，照在宛若白莲花似的蒙古包上。大海一样宽广的草原上，到处都飘荡着细浪似的“特咕——特咕——”的歌声。

奶桶满了，凤仙起身提桶回家。就在她起身时突然“咔吧”一声，她双腿麻木，倒在地上。孩子们闻讯而来，急忙推一辆勒勒车把妈妈送到医院。经过检查，大夫说：“关节炎、高血压、胆结石、肠胃还隐藏一块肿瘤，建议去首府大医院动手术。”无奈只好撇下家，由丈夫陪同她去呼和浩特住医院。孩子们正在念书，谁也不许去。

手术前她非常担忧，怕自己万一出意外，她要是走了，一群刚刚得到母爱的孩子岂不又变成孤儿！平时她守口如瓶，从不提到孩子，可是打过麻药昏迷中的她却神不由己地一个又一个呼唤孩子们的名字：“巴特——高娃，黄毛——其木格……”

手术成功，腹中的大瘤切除掉了。一位主治大夫来查房和她谈心：“入院时候你不是说一个孩子也没有吗？”

“是呀！我没生养过孩子。”

“那为什么手术台上你喊出一连串孩子的名字？”

凤仙红着脸低头不语。这是秘密，是她和孩子们共有的“隐私”：即使在家里谁也不许提到“孤儿”这个词。今天在大众面前，她也决心要保护住这个秘密不能泄露。事也凑巧，这时恰有护士送给凤仙一张汇款单，是草原寄来的15元钱，留言栏里写着：“您走后我们天天早起去草滩里捡羊粪珠、挖草坯，卖成钱寄给您买肉罐头吃，补养身体。”下面是六个孩子的签名。凤仙把汇款单捂在脸上，泪水顺着纸成串下流，汇款单也打湿了。

主治大夫似乎懂得了什么，不再追问，扶她睡好。

“听大夫讲话是上海人？”她擦干泪反问大夫。

“是呀，侬听得懂上海话？”

“懂得不多。我的孩子都是从上海来的。”

“噢，——阿拉明白了！”

聪慧的女大夫是上海来支边的老内蒙了，她清楚上海孤儿出塞外的全部背景。她握住凤仙的手说：“侬一人就养活六个，太辛苦了。我代表上海籍妈妈向您致敬！”

凤仙含着泪水，破涕为笑。

“该我谢你哩，手术做得好，伤口也快愈合了。”她又说：“你是知道的，那群娃娃我放心不下，我请求提前出院。”

得到同意，伤口未愈合她就提前出院了。坐了火车换汽车，坐了汽车换牛车，折腾三四天终于到了家。懂事的孩子把家收拾得挺干净，扶住她斜靠在被子垛上，一齐看护这位面无血色的“红脸阿姨”。

母亲的心细如发丝，她发现黄毛掉了扣子，“小猫”磨破了袖口，她让高娃拿过针线，靠着被子，斜着身一针针缝织那些绽口。

善良的道尔基经常从牧场带回肥羊尾，为妻子熬汤滋补身体。蒙古人历来认为肥美的羊尾汤是上等补品，能当药使用，几个孩子也在想着为妈妈找些好吃的东西。

一天下午，哥四个在湖畔割羊草，忽见一群大雁落在湖心岛上。又是“小猫”建议，去岛上捡水鸟蛋，最好能抓只活雁给妈妈吃。（当然那时候他们不可能有环保意识，他们只想为生病的妈妈找来丰富的营养品。）他们无师自通地在湖边井沿上抬来一条木头饮马槽。那是一块整木头挖成的马槽，简直就是一叶独木小舟。他们不顾危险，也根本想不到危险，用红柳木棍当桨，划得满开心，而且收获颇丰，得意忘形，晚饭也忘掉吃了。

家里饭好了却不见人回来。凤仙扶着两个女娃高一声低一声喊着

孩子们的名字，一步一挪地走到户外。

夕阳西下，阳光把她们的影子长长地印在草原上。走近湖边她们同时发现了那“船”。机灵的高娃立即大喊“哥哥”，声未出口，即被凤仙伸手捂住了嘴。其木格不解其意的还要喊，她用另一只手捂住。她低下头悄悄说：“傻丫头，不敢喊。吓住了他们，一慌乱要跌下水的。这湖水深，牛犊羊羔都淹死过。”

他们母女躲在草丛里，凤仙双手合十默默念叨，祷告神灵。好像在说：“老佛爷保佑平安，保佑我的孩子。”

孩子们回到岸边，脱下衣服包装战利品。眼尖的“小猫”发现阿姨，呼叫着跑过来。他以为会像往常一样，会受到阿姨的拥抱和抚爱，不料想阿姨却愤怒如狮，夺过木棍举手就打。打完一个再打第二个、第三个，打着还骂：“不懂事的娃娃，淹死了谁哭你们！这些没有娘的孩子哟……”

孩子们终于悟出了挨打的原因。他们知道这是只有母爱才有的厚爱，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次挨打。皮肉的疼痛和内心的疼痛，冲击着他们幼小的心灵，使他们一齐跪倒在母亲身旁，放声大哭。

江河水朝下流，母亲的心冲下长

我们去草原访问凤仙额吉时，正是她第二次从首府住院归来。这一次病症更多，主要有贫血和心率衰竭。所幸她精神甚好，心绪平和，总爱笑咪咪地和我们交谈。

她的贫血除去她无休止地操劳，直接原因是她在紧急情况下毅然为孩子献血。我说你身子这样虚弱，怎么还能大量抽血呢？她苦笑一下说：“保命要紧。蒙古谚语说得好：江河水朝下流，额吉的心冲下长。我没有生养他们的血肉，我应该给他输血。”

望着她有些憔悴的面孔，想起初见时她说的话，这是一位身患多种疾病的额吉，为孩子献血，难道这也像她说的是平常的、不值一提

的琐事吗？

那年“五一”清晨，凤仙正坐在窗前为巴特补靴子，突然其木格跑进屋高声喊：“姨姨，姨姨，走火了，巴特走火了！”

“拙嘴笨舌的丫头哟，蒙语汉语都说不清楚，是巴特走火打了别人，还是别人走火打住了他？”

额吉急忙蹬上靴子，扶着其木格往外跑。跑到巴特的宿舍。（那是“全民皆兵”的时代，十六岁的巴特参加民兵训练，住集体宿舍。）室中空无一人，炕上衣物零乱，流着一滩鲜血。他们急忙往医院急诊室跑去。病床上躺着个人，白被单罩住头，但从那身段轮廓，凤仙一眼就感觉到那是她的巴特。

这真是五雷轰顶，万箭穿心。但此时此刻她该怎么办呢？号啕大哭吗！对肇事者怨恨辱骂吗？不，她清醒、理智，关键时刻她是个有主见的母亲。她顾不上流泪，清醒有序地指挥着，配合着给巴特做完包扎，亲手扶着担架抬上急救汽车，护送巴特到民兵实习的战地医院。

那粒致命的弹丸是从巴特头颅正中穿而过。那子弹既残忍又“多情”。残忍是它击伤了一个苦命的孩子，“多情”是它的走向是那么小心翼翼，高一公分就能使他脑浆迸裂，低一公分就会击穿眼睛，它就是不高不低地正正地穿头而过。

当时精力旺盛的巴特血流如注，把两床被单都染红了。十万火急地抢救。战地医院是解放军临时草建的，血库里没有血，兴许压根就没有血库。一向瘦弱的黄毛，偷着悄悄给哥哥输了400CC血浆。几个小的知道了，伸出小胳膊都要给献血。凤仙走过去，把他们的小手拨开，轻轻地说：“孩子们，你们还嫩，正在长身体的时候，亏了血最难补。”她把袍袖子撸起来，对一位军人大夫说：“抽我的，我是母亲，母亲的血是原汁的。”军医毫不怀疑他们是亲生母子，便把大号针头扎进了妈妈的突出的血管里。鲜红的血浆像春雨洒在草原的沃土，母

亲的眼睛里流出了喜悦的泪花。渐渐地，少年巴特那颗充满青春朝气的开始跳动起来了。无论是先天的母亲的血，无论是后天的母亲的血，此时亲密无间地交汇起来，熔铸成一个生命的整体，滋润着这棵青春的籽种，使他从昏迷中醒苏过来。

一个多月后，巴特伤愈出院。这个月巴特是在苦苦思念中度过的。他想通了，他长大了，他懂得了无论从精神到肉体凤仙额吉都是他亲爱的母亲。他走进屋在凤仙面前“扑通”跪下：“妈妈，让我这张从来没有叫过妈妈的口，叫您一声妈妈吧！”几个弟妹也同时进屋，跪倒在地，齐声喊着：“妈妈——额吉，额吉——妈妈！”

生活之路

生活之路变幻多端，但是只要你执著追求，不懈努力，那么无论你深居在多么偏远的地方，你总能走到灿烂辉煌的明天。凤仙额吉这顶蒙古包够偏远、够荒凉了，可是包门口的草原小路就连着旗县公路，就能通向铁路，可以走向世界最繁华的地方。

由南方飞来的这半个“战斗班”，在仁钦·道尔基和凤仙额吉的照料下，经过严寒、疾病、饥饿种种洗礼，他们都渐渐长大成人。他们读完小学、初中、高中，正欲展翅高飞的时候，生活的暴风雨，又一次冲击了他们。

一天，孩子们放学回家，一个个左胳膊上都戴着红袖标，嚷叫着要到自治区政府“造反”。从这红袖章上凤仙一下子就想到他们初来时袖子上缀的白布条，她质问道：“你们要去造谁的反？”

“造乌兰夫的反，他是当代王爷。”

凤仙一听，气不打一处来，训斥道：“没良心的东西，要不是乌兰夫把你们从上海接来，说不定早没有你们了。去造反吧，到内蒙党委查查，最好把迎接你们来内蒙的文件都造出来！登在报纸上，让世人人都知道这群孤儿的来龙去脉。

孩子们自然都偃旗息鼓不再作声了。凤仙不放心，搬张椅子坐在门口纳鞋底，不放走一个。打远处走过来一个拉车人，凤仙认识他是学校里最有学问的奥斯尔老师。他毕业于北京高校，精通蒙汉文和英文，不知为啥他却成了黑帮。他拉车去滩里铲羊粪砖，是造反派对他的惩罚。凤仙前些年去学校接送孩子时早就认识他，也分外敬重他。

凤仙拦住他说：“奥斯尔老师，请你留在我们家教书好吗？我管你好吃好喝，一天替你拉一车羊粪砖。”

“要是学校造反派知道了怎么办？”

我家老头是转业骑兵，孩子都是党培养的红苗苗，根正苗直，我保证你没事儿。”

奥斯尔点头答应了。每天拉车来，放下车就进屋教书，晚上给他装一车羊粪砖拉回学校。在那荒唐的年代，全国上下无一处能放平一张读书的桌子。可是谁能料想到，在这偏僻遥远的草原上，一顶破旧的蒙古包里却组建了一所“家庭学校”。奥斯尔尽情地发挥他蒙汉英文全通的优势，孩子们凭着刻苦，也发挥了江南人灵秀的天资遗传，一个个都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这几个孩子后来上大学、当干部、参军、入党，都能顺利通过文化考核，究其根源都是在这时候学到的基本功课。

然而灾难还是降临了。一天，奥斯尔被揪走了，他和好多“牛鬼蛇神”挂牌子在城中心书店门外接受批斗。孩子们也去了，他们想保护自己的老师。有人说新华书店的书全是封资修毒草，红卫兵们把书搬出堆成山放火焚烧。

书像火鸟一样飞向空中，火烤红了“黑帮”的脸，也烤红了爱恋书籍的孩子们的心。

玉宝发现火堆里有一本《高玉宝》的书。他抢出来装进兜里，接着又发现巴金的书，茅盾的书，老舍的书，外国的《童年》、《大学》、

《母亲》，仅仅是这些书名就叫人着迷沉醉。他们几个兄弟，不顾一切地从火中抢书，脱下袍子把书包起来，“小猫”腿快负责运回家。往返七八趟，家里堆成小书山。他们坐下来讨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这些书算不算偷？告诉额吉吗？

正在犹豫，额吉来了。她手里捻着驼手绳，很欣赏地说：“你们抢救回来一堆宝贝。”从此孩子们很少外出，一天到晚坐在家里饶有兴趣地阅读那些叫他们感情激荡的图书。文革十年，荒废十年，究竟有多少人坐下来读书？然而，这几个远在草原的孩子，却在母亲的保护下，枯旱逢雨般地从书中汲取营养。

知识像一粒种籽，埋进了孩子们的心田，很快地抽芽、开花、结果。解放军第一次到草原招收新兵，一眼看中了玉宝和“小猫”。他俩同时参军，同到一个骑兵团，几乎同时入党、同时送回立功喜报。接着是其木格和黄毛，别看姑娘小时候拙嘴笨舌，经过考试进入太仆寺旗当话务员。黄毛耳病根除，出落的眉清目秀，他以优秀的数学成绩，被旗物资局录用并派往大兴安岭当木材采购员。他用旅差补助费从大兴安岭买回木耳、猴头、蘑菇，送给额吉滋补身体。他也寄信回来，但每封信都夹带一个寄给挨桃子的小纸条，说几句悄悄话，还经常提到分给她半个馒头的往事，逗大家一笑。不过笑谈之中一罐爱情的甜蜜已经酿成。有情人终成眷属。婚后他们住在本旗，生下一个叫特木勒的男孩，放到既是奶奶又是姑姥姥的凤仙家里。有了第三代人的哭闹声，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更像个家庭了。

巴特和幺妹高娃，双双考入名牌大学。哥哥在南京气象学院，妹妹在天津南开大学。感谢奥斯尔老师，她考入的是南大英语系。这消息不翼而飞，正如他们当年来到草原落户那样不多久，整个大草原都知道了。已晋升为旗长的宝音，颇为荣耀地特地赶来，登门向凤仙全家祝贺。

女儿登程前一天，凤仙把老伴从牧场叫回来，一定要他骑马送高娃去天津。她说天津是大码头，怕闺女找不见路，莫非南开大学的大门真是朝南开的？道尔基当兵时在天津打过仗，道路熟，让他送去放心。高娃执意不肯：“大爷的汉话不通，打仗时候那点记忆早忘光了。如今变化太大了，他去了更不好办。”妈妈不依，还是坚持要送。只是没有骑马，是乘旗里的长途汽车走的。

最后一个离开家的是长子巴特。

凤仙连夜为他赶缝一件驼毛背心。夜里，电灯亮了又灭了（这几年镶黄旗有了自发电，专供点灯，夜十一点即停电休息），她把早已备好的酥油灯点燃，戴上老花镜缝着。

在一旁收拾书箱的巴特一再劝阻：

“妈妈，南方热，不要做驼毛背心了。”

“南方天是热的，你的身子是凉的。你受过伤，要保护好身子。”

后半夜，驼毛背心做成了。古铜色的面子湖蓝色的里，细密的针线，柔软的驼毛像火炭一般温暖着巴特的前胸后背，他一穿上身就不想脱下了。

额吉说：“你到了南京离家更近了。”

巴特说：“不对，离家更远了。”

“明明近了么！”这几年送孩子读书中，她也学到些文化。她伸手在地图上量。“看，南京到上海不到二指远。”巴特走过去用手量地图。他中指按住锡盟，伸开大拇指很勉强才够到南京：“妈妈你看，远不远嘛？”阿妈语重心长地说：“傻孩子，你是妈的尤亥呼（长子），你懂事些，你去南京利用假日一定走一趟上海。”

“妈妈，您要我去买什么东西？”

“唉，我要你去上海找一个人，找你的生身父母。你来的时候六七岁，有点记性了，找找你那个家，细细探问你的生身父母在不在。

你们哪里懂得，十月怀胎，娘身上的肉，永远也忘不了的。当初他们可能是一时生活困难，甚至可能是在忙乱中走失了，他们兴许一直都在四处寻找你们哩。要是真的找见了，亲爹亲娘和你又重新团圆，他们该有多么高兴。当他们知道他的孩子上了大学，他还有个草原妈妈，她会来和我结成亲姊妹。蒙汉人家世代深情，该有多美好！”

灯光迷离，巴特似乎真的回到了江南水乡，那段永不消失的记忆，又一次清晰浮现眼前，一条河，河边一座阁楼，妈妈在阁楼上晒衣服……那记忆太遥远，太模糊了。而眼前的羊圈、羊粪砖砌成的院墙、奶茶的香味、母亲的血点点滴滴下落……他忍不住又落下泪。家，不就是亲人同住的地方吗？离开了亲人还有什么家呢？

清晨，巴特背起行装上路了。邻里、兄妹都来送行。他单腿跪地一连喝下妈妈倒下的三碗马奶酒。他该走了。但他知道，不要多久，他又会回到这个抚养他成长的家里，回到养育他长大成人的草原上。

红日当头，草原无限辽阔。他像一只小舟驶出港湾走向征途。十多年前他们是秋凉时候来到草原的，那时雁往南飞，他往北走。如今也是秋天，也有一群大雁朝南飞去，只是他的走向变了，他也和不畏征途遥远的雁群一样朝着同一个方向飞去。情景相似，人却大大地不相同了。

巴特踩着路上的小草往前走。他知道额吉说过的话，她对孩子的爱和小草一样，普普通通不值一提。可是当草儿汇成大海，孩子创造出大事业的时候，母亲的爱、每一滴汗水、每一棵草儿，就会变得格外清爽，格外嫩绿，格外可爱了……

草原俩兄妹

乐 拓

去年夏天，我在家闭门写作，一位北京来的女将拍门而入。

她自报家门说，她是北京一家电视台剧目策划人。这次来访就是要和我合作，由我撰稿共同策划出一部多集电视剧。

我一听搞电视剧，心里就害怕，我怕“触电”。过去我已经多次在电视剧门前败北了。我很清楚的知道，那是个“十谈九空”的马拉松，尽量不要介入。那位女将很有经验，她不气馁，她亮出一张“王牌”，说：“其实这个戏我已经拉好了赞助。一位内蒙碱商答应出资。”她很地道地设想着：“有了钱，有你掌握的那么多孤儿们的故事，得，这个戏就算成功了。”

我问她，“那位碱商老板为什么要出资赞助呢，他的要求是什么？”

“这么说来你对行情也是很清楚的么。是的，没有个人要求和想法随便拿出几十万是不可能的，不过，这位老板的要求不高，他只希望能把他妹妹的故事写进去，增加一场戏，因为他的妹妹也是当年由南方来的孤儿。”

她的这种坦然相告，引起我极大兴趣。许多年来，我和孤儿出身的人交朋友，最大的困难就是不能轻易地和他们谈孤儿的往事。那是他们内心深处的隐痛，一经碰撞就会流血。今天居然有人跑来介绍，他妹妹就是孤儿，还肯出资赞助，要求编入影戏。这太难得了，单单为了知道这位孤儿的故事，我也要去访问他们。

本应该先到锡林郭勒盟，访问那位碱厂老板，请他讲述他妹妹的故事，而那位女策划人却说：先到呼市吧，他们的老爹、老妈都在呼市，老头曾是自治区一位副厅长，离休了；老妈也是位老干部，又是

当事人，谈得更生动些。按照她留下的地址、姓名、电话，我放下手头的文章去呼市访问。

在呼市下车后，没有急于出站，我在一股岔道上辗转徘徊，因为女策划人说过，他们的故事是从呼市火车站开始的。困难年月，那一对老干部夫妇，就是从停在这里的专列火车上，抱走的孩子。——当我拜访那两位老人时，他们也是这样说的。——

1962年夏末秋初的时候，今天的这两位离休干部，当时还是风华正茂。那时他们虽然是战功卓著的老兵，但头脑中还是一片天真无邪，一片善良，一片简单化。

他们手里握着由卫生厅负责干部写的一张字条，兴冲冲地往火车站里走。

也就是在这年秋天，他们听说有一批上海孤儿、接运到内蒙古来抚养，立刻动了“爱子之心”。他们商量，向有关部门要求，批准他们去抱养一个孩子。他们的要求破例的得到了允诺。

他们走出小卧车，走进火车站。拉运孤儿的车厢就停在火车道岔上。他握住字条，就像拉住了一个孩子的小手一样，心里激动得噎噎直跳！他们彼此互相看了一眼，脸红红的，有些按捺不住的兴奋。他们不单是今天要抱养一个孩子，他们共同拥有过的另一个孩子的形象，此时也同时出现在这一对革命夫妇的眼前。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今天的副厅长，当时的骑兵团长，正率领队伍在锡林郭勒大草原上打仗。一群流窜残匪，在中蒙边境线上时出时进。骑兵团和他们激烈地争夺，杀进杀出。

在一次追击战中，团长的夫人团卫生队队长乌兰花，就要临盆生产。夜晚，仓促之间，他们从马鞍上滚落下来，一个男孩，啼哭着，在征战的马背上，走进了这个战火纷飞的世界。

因为战争，点一把烘干衣包的牛粪火都不允许。多亏乌兰花的医

疗常识，她脱下军衣把初生儿包好，揩干血迹，扑伏在马鞍上，任战马驮着随意行走。

终于，识途的马走进一个小小的浩特里，一位蒙古额吉，打开包门，接待了这位诞生在战火中的蒙古人的后代。

战争，残酷的战争，逼迫着乌兰花不得不和亲生的儿子分开。她给孩子取名叫布尔固德——鹰！能高高飞翔的鹰。能看到草原，看到他生身父母的雄鹰。

妈妈把幼小的雏鹰寄养在浩特上，交给那位名叫哈拉罕台的老额吉家里。妈妈——骑兵团的卫生队长和初生的孩子，洒泪而别。

战争终于射完了最后一粒子弹，战事平息了。但是平息战争之后的第一件事，在当时人的心里并不能马上去寻找儿子。好像孩子是住在姥姥家一样，到时候接回来就行了。

八年过去，到1956年，他们才腾开手回到草原上去寻找那个在战火中出生的儿子。草原辽阔，犹如大海，他们真的像大海捞针一样没有着落。八年时光最平静的草原生活也有了数不尽的变化。更何况当年正在征途，黑夜茫茫，加上逐水草而流动的牧民，使他们问不出一一点消息。当年的草滩、浩特、人家，早已不知去向，他们只能对天长叹——孩子，为革命咱们失散了！

几年之后，当第一批江南孤儿来到内蒙，组织上第一个把消息告诉他，特别批准，允许他们优先去火车上挑选一个孩子。

他俩走进车厢，一张张天真稚气的孩子的脸，叫他们心里喜滋滋，甜蜜蜜的。他们无心商量该抱哪一个，更不去挑男选女。只觉得每个孩子都是一朵花，任何一朵花都使他们陶醉，叫他们开心。

正想着，突然一张瘦小的脸，一双笑咪咪的小眼睛对着他们笑。乌兰花伸手将她抱起来，那孩子同时伸出双手，紧紧搂住乌兰花的脖子，伏到她胸怀上，笑着笑着大哭起来。

革命者不讲轮回报应，不讲前世机缘，只讲一个“情”字。既然那孩子哭着搂紧脖子不放手，她就应该是你的孩子，是家里人了。经过交涉，他们就选准了这个瘦瘦小小的女娃。妈妈是大乌兰花，给孩子取个名叫小乌兰花。

从此，这个沉静的家庭里有了欢声笑语，有了尿布的骚味和牛奶黄油的香味。小乌兰花在这些综合的生活气味中，渐渐长大，会跳了，会唱了，会上学认字了。

汉族人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其实不然，有时候横福如飞，连连冲击那些倒霉的人。有时候，福音连降，许多人家天天都鸣放鞭炮，喜事不断。小乌兰花的到来是第一喜，不多久，第二件喜事突然而至。在锡盟地方政府帮助下，他们失散多年的布尔固德——鹰也飞回来了。他已经是少年的鹰，牧区的奶食羊肉，把他养得牛犊子一样壮实。

鹰和花结成一对亲密的兄妹，他们一起上学，遇到有人欺侮，鹰伸出臂膀保护妹妹，遇到算术难题，妹妹伸长细小的手指教他。鹰幼年生活在草原上，发蒙晚，尤其复杂的数学，简直一筹莫展。

他们就在这种两小无猜中，度过了天真烂漫的童年时光。

对于那一代的孩子，童年相当短促，因为饥饿的年月刚刚过去不久，很快就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烧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那场大革命中每一个孩子都早熟、每一个孩子都被烈火烧化了天真的童年。

在那场大革命中，内蒙人、特别是内蒙的蒙古族老干部，都有一个在劫难逃的罪名——“内人党”。大党阀康生一手在内蒙策划出一个弥天大谎，杀气腾腾的“内人党”大冤案。昔日在草原上战斗过的骑兵团长，毫无疑问被打成“内人党”骨干分子；用医药包扎过骑兵伤病员的卫生队长乌兰花，也成了“内人党”急先锋。就连那个革命

的后代，刚刚飞回来不久的小鹰，也成了“黑五类”“黑崽子”。对他们的处理是押送到草原上，让那些受过他们“压迫”的革命群众彻底批斗。这就意味着这个革命的家庭即将分崩瓦解。此时，聪明的小乌兰花昂然站出来说：“我是红五类，我是孤儿。”她把自己最神圣的“秘密”、自己亲手暴露出来，以此换取了一份信任。她作为这个家的一条根，被保留下来，支撑着，使这个家幸免了一场土崩瓦解的灭顶之灾。

从此，小乌兰花重新过起了孤儿的生活。八年前，她三岁时就是一个孤儿。那时候她在上海孤儿院，她的生活由穿白大褂的保育员阿姨负责；八年后，她十一岁，她又成了孤儿，这时候她的一切起居饮食，只能靠自己自给自足。

那时对于这个孩子最大的困难不是吃喝，而是对爸妈、对鹰哥哥的担忧和思念。她听说邻居家巴图叔叔在审讯中被打死了，她听到有人在私设的刑堂上被打得大声呼叫。她不怕鬼神，她怕半夜里有人打着手电闯进家门造反，把那些她喜欢的图书、画册放火焚烧。她能跑到阿爸的工作单位里，求好心的阿姨帮助她领取阿爸的工资，再求善良的大姐姐，帮助她填写汇款单，把钱寄到爸妈受劳改的地方。孤独的长夜里，她做了多少梦，梦里总是那么吓人，把她从梦中吓醒。十一岁的孩子，本来正是读童话的时候，然而她的童年却是恐怖、是血、是火！

无论多么可怕，她总是大胆地把门户关好，把房间打扫干净，把院子里妈妈种的葡萄，浇水施肥，把小花园中的野草清除，让鲜花盛开。

一个冬天过去了，又一个春天也过去了，等到夏天，她的亲爱的爸爸妈妈、布尔固德哥哥，带着满身的大草原的香味，回到了她的身边。在这一年多的时光里，乌兰花长高了，长大了。他们彼此没有语

言，互相搂住，坐在绿茵茵的葡萄架前，沉思着。泪珠像葡萄串一样，一颗颗往下滴……

妈妈，大乌兰，这朵昔日开放在战争年代的大红花，如今早已鬓发斑白，像许多干练的蒙古族女干部那样，把斑白的头发梳成辫子，再把辫子盘在脑后。她站在自家的庭院里，指着那架葡萄说：“如今它也老了，果子稀了，味道也不够好，可是我们保留着它。它是我们这个家的根。”

望着这架葡萄，我们自然要谈到小乌兰花。妈妈说，这孩子很争气，最爱上学读书。经过了那场灾难之后，她变得少言寡语，一门心思上学。终于考进了北京大学，当了工程师。

“你们的那只鹰呢？”我问她。

“他呀，没有飞高，又飞回去了。飞回到养育他的那片草原上，找到了养育他的额吉。如今在草地上开碱厂，当厂长哩。”

我说：“这也应了蒙古那句谚语：鹰飞得再高，影子还在地上。”

母亲还是不失爱怜地说：“这只伏在地上的鹰却做着高飞的事。——那一带草原比较贫困，草不好，地面起碱，低洼地方形成一个连一个的白碱湖。蒙古话叫查汗淖儿，汉意就是白色的湖。布尔固德就在那里开碱厂，还试验成功好几种白碱为主的化工原料。这几年那一带牧民生活由穷变富了。经过提炼纯碱，大片的草滩又开始新生，湖水变绿，草原变青，比我们当年在那里打仗时候漂亮多了。”

“那您也该回去看看了，那是你们流过血汗的地方。”

“不瞒你说，我们正考虑着全家迁回去养老哩。我们在那里打过仗，流过血，抓‘内人党’时候又在那里改造、流过汗，也流过泪。那是一块永远忘不了的地方。”

“能在那里安度晚年真是太美了。最好把小乌兰花也请去，她不是学化工的吗，让她去开化工厂，把草原建设得更美丽。”

“我们这个家矛盾也就在这里呀。你要是聪明你会想象得到，我那只鹰，性格有些野，他比妹妹大，懂事早，他早已偷偷爱上这个妹妹了。——对于他俩的婚事，不少亲友都搓合过。按说也是很难得的一对。可是他的爸爸坚决反对，他是老观点。他说，当初我们是当亲生子女抱来的，他们俩自小玩大，是亲密的兄妹，亲兄妹怎么能结婚呢？”

我说：“这事情得听孩子的意见，他们都长大成人了，他们自有主张。”

“唉！他们的意见是牛蹄子，两半子。哥哥是坚决要娶她，——他已经结过一次婚，又离了，就是要等着娶她。妹妹死活不干，但又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兄妹感情。妹妹多次电话中表示，哥哥要是不再向她求婚，她就从北京辞职，去草原安家，把哥哥的碱厂改造成高科技化工厂。要是再纠缠她，她就不和哥哥见面。——这就是矛盾。我家老头上星期去草原找儿子去了。其中一条任务就是说服儿子，另打主意。这样可以把妹妹接回来，我们也可以回到草原上，共享天伦之乐。”

“你估计老头能把儿子说服吗？”

“难呀！这个雄鹰，自小性野，任性，好斗。我们早些年给他找过一房媳妇，结婚好几年，感情不合，连孩子也没有，前年还是离异了。那意思很明白，非娶小乌兰花不可。”

“可是你说，这个小乌兰花也真有意思，三十大几了。从不谈朋友。她一边拒绝着哥哥，一边又和哥哥感情很好，她说这是亲亲的兄妹情。每当我劝她结婚时候，她就赖着我说：‘妈妈，我不出嫁，我守着你过一辈子，为你养老。’唉！人的心很小，却谁也看不透。人常说，知子者父母。我们对于他俩的内心活动，知道得太少了。”

是的，他们对子女的内心知道得确实太少了，尤其缺乏理解。比如布尔固德准备投资数十万元为妹妹写电视剧的事，这对老革命夫妇

知道吗？即是知道，能够完全支持吗？对于布尔固德来说这是正常的。既是对艺术的醉心，也是他对爱情的全力投入。但是这惊人的投入壮举能换取小乌兰花的青睐吗？她是赏识或是反对？是热情或是冷漠？我无法知道；但又很想知道，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未来的电视片是成功或是失败！

我还是要劝劝北京那位策划人，不能高兴得太早。这个故事够曲折够浪漫了，完全可以编成多集电视剧，但是布尔固德那笔资助能落实吗？

在绿茵茵的葡萄架前，展望着乌兰花的满头银发，我浮想联翩，真是一部异常壮美的电视剧——可是我又在犹豫，我的电视片恐怕和布尔固德的爱情差不多，即使大力投入了，其结果，很可能也是一场空——

草原觅踪记

乐 拓

十五年前的冬天，为了寻觅江南孤儿在内蒙古的足踪，我深入到锡林郭勒草原采访。在这次历经两月的草原旅行中，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至今那段往事，那些人物，依然历历在目，如同眼前。

我最初是从《人民日报》上获得这个信息的。报道说，在我们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一批上海籍孤儿被护送到内蒙古草原，被牧民收为义子。二十多年后，这批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有的参军参干，有的当牧民，有的当工程师，有的上大学，有的当艺术家。他们形成牧区新时代的代表。这消息真叫人醉心向往。凭着作家的良知，我不顾一切地扑向了锡盟大草原。

在内蒙古档案局我找到了几份关于护送孤儿来内蒙古的文件。我肃然起敬，原来这件事的初衷，是来自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乌兰夫等许多领导人。他们在人民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悄悄的在耐心做着工作。

我们都知道，人是第一宝贵的。生的权利、人格的尊严在我们国家受到无比尊重。世界上许多原因都能造成孤儿，战争、灾荒、瘟疫、疾病，至今还在制造出许多孤儿，他们是不幸的人。但是他们的命运、遭遇却不尽相同。这不决定于孤儿自身的“天命”，而决定于他们所处的时代，所在的国家，在于这个国家人民的风范和觉悟。江南上海等地出现的这批孤儿，正是我们国家遭受特大自然灾害时期。那时候，上至总理下到平民，几乎都在忍饥挨饿。可是对于这批孩子，人民没有亏待他们，将他们接至内蒙，被牧民人家收养。这在当时是一种最为上乘的解困的办法了。

我在锡盟采访过一位名叫小猫的孤儿。他来内蒙时五岁，属“大龄儿童”，对当时的情景他有了记忆。他说他们在上海时候，住的是

保育院，住楼房，有活动室，像学校一样，有老师上课，有穿白大褂的阿姨护理我们的生活。离开上海来内蒙时很隆重。坐的是“专列火车”，有人在车站欢送。每列车厢都配备有大夫、护士，有阿姨讲故事，吃的是饼干、水果、牛奶。火车到内蒙，护送我们的大夫阿姨要回去了，他们把我们抱在怀里亲，不放手，好多阿姨都放声大哭。

不单是送得隆重，内蒙的迎接也很周到。首先新来的儿童并不是直接送入牧民家，而是先在呼市、包头、集宁等地大医院里住下，检查身体、打预防针，住两三个月，让他们完全适应内蒙地理环境、自然气候之后，再往草原牧民人家转移。那次我在锡林浩特访问过一位王大夫，她是儿科医生，她说当时她被抽出赴包头迎接孤儿。她是在包头第二医院儿科病房第一次和孩子们见面的。王大夫说，从医疗角度说这个安排是合乎卫生科学的。江南和内蒙万里之遥，温差极大，上海几乎是海平面，而内蒙高原海拔两千六七百米。当时孩子幼小，有的还在襁褓之中，剧烈的地理变化会给孩子带来许多不适应。休息三个月，用时髦话说进行“软着陆”，孩子就安全多了。事实证明，上千名儿童集体行动，能够个个成活，个个健康，当时的组织安置工作是起着很关键作用的。

据介绍，当时进入锡盟的孤儿分两条路线，一条由张家口换乘汽车北上，过张北、坝上，进入锡林浩特。这批孩子大都分配到了锡盟东部旗县。另一条路由集宁下火车、换乘汽车，马车，牛牛车，经过商都、化德，再分散到西部区的旗县里。我考察的地区在西部黄旗。我也在集宁下车，顺着孩子们走过的线路，转乘汽车进入草原深处。

集宁属于内蒙中腰部，背靠蒙古国，一派广漠大草地，使西伯利亚寒流长驱直入，气候特别寒冷，是出了名的“冷冻城”。我去的时候公路运输依然很不发达。去化德的汽车每天只有一趟。而且车况、路况都很糟糕。等了两天才买到车票，老天像要考验我的决心似的，

出城不一会就下起了鹅毛片似的大雪，刹那之间天地变成一片洁白。路被雪埋住了，道很滑，我真担心汽车会一下滑倒。更担心司机发脾气，他要是一怒之下，放下车不开了，丢下这一车人在荒滩野地里可怎么活！

我立刻想到当年的孩子，他们也是由这条路进草原的。那时候路况更不好，9月天气，虽无大雪却也落霜了。出塞的孩子们看到这广袤平川的土地，小小的心灵上打下的是什麼烙印呢？

雪无休止地飘落，雪花从破了的车窗飞进来。我的双腿双脚，早已冻得冰冷麻木。

雪地里一个翻穿羊皮袄的人在拦车。多谢司机发善心，开门接纳了他。那人脸发白，唇发紫，浑身冻成硬棍，呲着牙一个劲地傻笑。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笑不是他的本意，是寒冷中冻僵了肌肉，面部抽搐，露出“笑容”。据有经验的人说，冻死的人都是笑着死的。

同车的农牧民很善良，纷纷为冻僵的人让坐，给他毛巾擦冰水。有个老者从皮袄里摸出一把匾酒壶，命令似地说：“拿去，快喝几口酒，要不就冻死了。”我也参进去，点支香烟递给他。好久一阵折腾，他才露出几分活人模样。

我所以忘不了这件事，是因为几天后采访凤仙额吉时她也说了在背粮途中，差点冻死的事情。她也是在这一条路上，没有车，徒步行走。她在化德接待站里为孤儿们领了三十斤大米，回家路上遇到了暴风雪。她跌进雪坑里，眼看快冻死时候，她忽然听到了孩子们在很远的地方向她大声呼唤。她挣扎着从死神手中走出来。她说：我不能死，不能让刚刚得到母爱的孩子又失去妈妈又变成孤儿。她一路爬着回到了自家的蒙古包。

后来我把这件事如实地写在电视剧和报告文学里。我赞美额吉，也希望更多的孩子知道，蒙古妈妈为了养活这些幼小的生命，不惜一

切，勇于奉献，像爱护亲生的孩子一样爱护他们。

黄昏时候，汽车驶进化德县。所有下车的人都先蹲在地下，很久很久站不起来，冻得麻木的双脚，迈不出步子。

当时的化德很简陋，找不出一条街道，几座平房散乱的立在雪原上。只因为他的位置适中，由此去黄旗、兰旗、白旗，都是一天车程，因此当年孤儿们进入草原时，在这里建立了“接待处”和“转运站”。大约那是化德最光彩、最红火的时候。可惜她的确太简陋了。当夜我寄宿在一户没有窗的小旅店里，独自个喝下半瓶 62° 衡水老白干，昏昏昏勉强入睡。

第二天又坐了一天汽车才到达黄旗，才进入真正的草原深处。当时我感到这里实在太遥远了，无论是从包头、呼市来都要走三四天路程。孤儿们是从上海来的，简直遥远得没有边际了。按中国古老的传统说法，孩子时期能远行，长大了必有大福贵。当年来草原的孩子，如今个个成人成才，是不是和他们的幼年远行有些因缘呢？

黄旗是一座很漂亮的草原小城。起伏平缓的山坡上，立着白墙红瓦的平房，一条清彻的小河环绕山脚，从城中心流过。这里水草丰美，草原辽阔。清朝时期这里是蒙古八旗军的牧马场。如今城四周有好几家良种羊、良种牛牧场。

我住在旗委招待所里，烤牛粪火、喝咸奶茶，时时吸吮着草原牧区的奶香气味。

我要采访的重点人物是张凤仙，她的家就在招待所附近。前几年凤仙额吉担任过招待所副所长。因孩子们拖累她、疾病缠身，提前退休了。她收养的六个孩子都很孝顺，经常从北京、南京、东北，背着大米、提着点心回家看望她，附近的人都羡慕地说：“凤仙是黄旗最有福的人。”是的，我也看到了，她那多病的脸上常常流露出幸福的笑靥。可是谁都知道，这幸福的花环是她用双手几十年如一日不停地

编织出来的。

当时我为了把孤儿们的命运写得更丰富一些，我要求旗委帮助，希望找到更多的孩子，拜访更多的额吉。这件事当时有一定的困难，不单是交通不便，重要的是心理障碍太大。张凤仙的优点是收下孤儿之后，不让孩子们叫妈妈，让叫她阿姨，因为她总是在替孩子们着想，希望有那么一天能找到孩子的亲妈。她的大孩子巴特考入南京上大学，临行之前她动员孩子假期去上海，查访他的生身父母。她替孩子颇为浪漫地幻想着：要是真的找到了你的亲妈妈，多好呀！我和你妈妈就是民族团结的亲姐妹。再说孩子都是娘身上的肉，随便就去了？不可能，兴许多少个母亲至今还在日夜思念，日夜寻找他们的孩子哩。但是草原上更多的额吉，她们抱的孩子小，孩子第一句话就是用蒙语说出来的。他们从来都不愿把这个心底的秘密揭穿。假如当着生人的面你指着人家的儿子说：“这孩子是抱来的。”这样的鲁莽很可能会引起一场械斗。

我请民政科小包同志陪同，既任翻译又当向导，我们一起走访牧民家。

我们乘坐当时旗县中最高级的汽车——“212 吉普”，在没有经过整修却极平坦的草原公路上飞驰。

我们要去的地方叫格根召庙。那里确有一座古召，门廊已经倒塌。同行的小包说，庙附近住有十八户人家。过去是一级牧业公社，如今公社像古庙一样倒塌了，牧民们组织起来联产承包，生活比以前富得多了。他还说，这十八户牧民中，每一家都收养过一个到两个南方来的孩子。你可以看，可千万不要直接问他们的家事。

说话间，从弯弯的山沟里跑出来一匹马，光背马上骑着一个小伙子。他不握缰绳（光背马本来也没有缰绳），腰板挺直、马靴修长，狐皮帽子歪戴着，双手在皮袍子里斜插着。他的马随心所欲地忽快忽

慢，上身始终板直，双手纹丝不动。老实说这样娴熟地骑技，我还没有见过。他的神态使我想起了《静静的顿河》影片中的葛利高利。

他把马在我们汽车前晃了一圈，有种表演似地夹一下马肚，飞快跑开了。小包说：“看见了吧，这就是一位孤儿。他叫僧格，念过中学，当过牧业队长，现在是良种场技术员。他去年新婚，要愿意咱们可以去他家玩”。

我们进入僧格家，他早已放走乘马，坐在包里喝茶。

他以最标准的蒙古族礼俗接待我们。进门先喝三杯酒，先问候草场、牛马、再问候起居生活。他年轻的妻子靠在“灶房”边的木箱上，怀里抱个初生婴儿。他的额吉见有客人进屋，拉开箱柜，端上冰糖、月饼、奶豆腐。但她的注意力并不在我们身上，来来往往之中，她始终被儿媳怀中的小宝宝吸引着。

我们把话题落在新生儿身上。

那孩子白净、秀气，眼睛像乌黑的宝石一样放光。我不由地抬头端详孩子的爸爸、妈妈。活脱脱的，一对小夫妻是一对美人儿。尤其是年轻的母亲，鸭蛋形的长脸盘，弯弯的眉毛，水灵灵的大眼睛。老实说，就是今天她走在南京路上，依然会招引来数不完的“回头客”。她的丈夫活像葛利高利似的小伙，依然是腰板挺直，换了一顶宽边礼帽更添了几分英俊。我惊叹人的先天遗传基因怎么会这样厉害！二十年，他们的生活习惯，饮食打扮，乃至最顽固的语言，完全都蒙古化了。然而仅仅是那么一丁点先天的遗传，却依然故我，保持着故乡的祖传的基因。对于上海他们已经全无记忆。他家的年历上，也有几幅江南山水图画，但已不是对故乡的纪念，而是当作祖国壮美的山河欣赏。蒙古人最高兴的是客人喜爱他们的孩子。告别之前，我特意去逗逗那个襁褓之中的小宝宝。果然老额吉，年轻的夫妻都和我一起围住孩子。孩子幸福的在妈妈怀抱中格格发笑，所有的人都跟着一起笑。

旧社会，这一带草原上，疾病流行，孩子成活率很低。有句俗话说：“蒙古包里只听见孩子哭，听不到孩子笑。”因为许多幼儿长不到会笑就不幸夭折。今天这里南方孩子已经有了新一代婴儿，格格的笑声是人丁兴旺的代表。

一天有人告诉我说，哈业敖包有个姑娘成了艺术家，她也是当年来的孤儿，你不去看看？这消息令人神往。凤仙额吉的儿子巴特当了工程师，小女儿高娃在北京当了英文翻译，这里又出现一位艺术家。昔日的孤单儿女，而今都成器成才，这真是锡林郭勒草原的福份呀。

这一回我是和小包一起骑骆驼去的。下了雪，路不通，只有不怕辛苦的骆驼能够踩碎冰雪，找到最近的道路。

冬天在草原上骑骆驼长途旅行真是别有风味。起初，骆驼是那样温驯的弯下前蹄，让你安全地在跨在它的驼峰上。然后猛一抬头、嗨，只有这时候你才知道它是个庞然大物，你有了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在驼峰上你可以任意地把手脚塞进毛绒绒的驼绒里，它的全身像个巨大的热水袋一样。它不动声色，似乎走得缓慢，其实步履宽大，实际速度很快。三十多里路程两小时就赶到了。

因为不通电话，信息不够准确。这家的女儿萨仁花到首府呼和浩特去了。严格讲她还不能是歌唱家。她是被旗乌兰牧骑选为歌唱演员，如今又派到首府艺术学院进修。当然这样的身份、阅历，是足以让这一带牧民感到骄傲的。她很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了不起的艺术人物。

萨仁花的妈妈很健谈，而且大约是因为女儿不在身边的缘故吧，她放心地谈出当初抱这个孤儿的许多秘密。

她说抱的时候我家男人不喜欢，重男轻女，他要抱一个长大了会放马的人。我说我想要个闺女，到老时候有些话只有和闺女好说。我坚持着把这个黄毛丫头抱回来。现在证明多好呀，当了演员，送到首府上艺术大学。这草原上哪一辈子出过这种人才？

小包和她开玩笑说：“大妈，你也是人才，你是远近闻名的歌手，是你的歌养育了萨仁，培养了萨仁。”

“哎，我的歌，都是苦的，都是悲歌。我们从小过的就是悲苦日子。”

在草原上我拜访过许多蒙族老人，他们给我的全部印象就是孤独、凄凉。很少听到他们畅快的大笑，总是默默无声地独坐，偶尔唱歌，也是凄楚悲凉的调子。这是民族的特点吗？不，这是过去那时代、单调和苦难，铸造出的性格。

在我们要求下，额吉低声的，无伴奏的为我唱了一首歌。歌的名字叫《孤独的小驼羔》。

孤独的小驼羔哟，你的妈妈呢？

孤独的小驼羔哟，为什么你不回家？

呵！你找不到妈妈，

呵！你没有家……

黄昏时候驼蹄扑哒、扑哒，踩着草原上的积雪起程。我骑在驼峰上，回头望望萨仁花蒙古包上的那盏明灯，额吉歌声的旋律久久在我心中回荡着。她一定在期待着她的孩子早日学成归来。她老了，她要 and 闺女坐在一起谈谈心里话。我相信学成归来的萨仁花，会给她的蒙古妈妈，唱出充满欢快的、新一代牧民的生活赞歌。

怀念额吉

乐 拓

春节前夕，家家户户张贴春联时候，飞飞扬扬下起雪来。

鲜红的春联映着洁白的雪花，晶莹剔透，喜气溶溶，增添了许多新春佳节的年味。

望着雪，望着楹联，在这新年即将来到的时候，我想起一位蒙古族妈妈，想起了凤仙额吉，似乎她还是站在雪地里送我；似乎她在非常遥远的，冰雪玉肌的雪山上，向我招手，呼唤，向我低声述说……

那也是即将过年的时候，我决定要和凤仙额吉告别。你问我，就不能留下吗？留下来吧，孩子们也要回来咱们一起过团圆年。我说：“不能了，我家里也有妈妈。”你再也不说了，只顾用心地为我准备送行的晚餐。

晚餐十分丰富，把年货的一半都搬出来上了桌子。你却遗憾地说：“来不及杀全羊了，来不及做羊血肠了。下次来吧，留下一个想头。”

凤仙额吉，在你家这张小小的炕桌上，你为多少远去的孩子送过行？大孩子去南京上大学，你在这张小桌上摆的是全羊宴；老二、老三参军，你把他和他们的好朋友都请到家在这小桌上喝的壮行酒。老四去林区当干部，大女儿去太仆寺当话务员，你都是在这张小桌上，倾囊而出，为他们置酒。连小女儿高娃去天津南开上大学的前夜，你给她做的蒙古袍也是在这张小桌上熨平的。这张小桌像一个启航运行的码头，也是你的儿女归来休息的港湾；这张桌子有你做的菜肴，也多次摆开儿女归来时带回来的大米、肥肠、美酒、香腊。我低下头，默默地吃着你做的饭菜，因为我没有为你留下过任何礼物。

你说为什么要答礼呢，好人相逢，图个情义。你几千里到草原来看望我们，这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终于我还是说出来了，我说我会把你抚养孩子的事迹写成文章，拍成电视片，再来时候，带着片子来看望你。你也笑了，你说那敢情好。那就不是我们一家的事情了，所有养活过孤儿的人家，看了片子都会流泪的。

那晚上，道尔基大叔也特别激动，他以一位老骑兵连长的口吻拍着我的肩头说，“来吧，你也是当过兵的人，咱们以军人的礼节，好好喝几杯。”说完他跑到院子凉房的地窖里拿出两瓶洋河大曲酒。他说：“认得吗？这是江南的名酒，是三年前我儿子在南京上大学时背回来的。那小子很孝顺，年年回家都带东西。有一回背了两百斤大米回来”。在下手坐着的巴特接过去说：“不是我孝敬，是我们困难时期饿怕了。那一回额吉去化德给我们背大米，她几乎冻死在雪地里。”

一句话说得全屋鸦雀无声。过了老半天，还是风仙打破了沉默：“快喝酒吧。别提那些陈年往事了。”

酒过半夜，最终达成的协议是：明天一早我独自上车，谁也不许去车站送我。

第二天一早，我去车站，果然不见送行的人。那天早晨就下了雪，有人在响炮，春节就到了。我庆幸拒绝了他们的送行。要不然，这风雪，这寒冷给他们多病的身子造成多大的困难。不料，当我一步踏上汽车的时候，风仙额吉、道尔基大叔突然地从风雪中冲到汽车跟前，泪水模糊地和我告别。我打开车窗和他们握手，巴特机灵地把一包肉干、黄油塞到我的座位上。车开了，走出很远，一家人还站在雪地里，挥手和我告别。

这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一幕，永远也不可能再现的一幕。自此之后，我再没有回过草原。因为我的电视片子始终没有拍摄成功，我无脸去见额吉。

可是几年中，额吉却总是托她的孩子给我捎信来，请我回去，吃

全羊宴。她还说，什么电视片呀，不就是平常人的故事吗。日子过好了，天天都是过年，天天都在演电视。

的确，这些年，我们的生活都在一天比一天好。你的六个子女一个比一个出息、进步。你有了第三代人，你们由昔日的六个“孤儿”发展成三十多口人的幸福大家庭。这是一个家庭的发达，也是整个草原的发达。他们哪里还是孤儿，他们是幸福的、亲友众多、和睦友爱的大家庭。所以去年夏天，我决定重返草原，为凤仙额吉这一大家人，拍一部新的合家欢乐的电视片。

我将长途电话拨到锡林浩特巴特家，巴特一听口音就叫我王叔叔。我说明我要去为他们拍片子，巴特立即失声痛哭着说：“王叔叔，不要来了，额吉她已经去世。”

我问他开没开追悼会？有些什么仪式？他说开了，很隆重，妹妹兄弟都回来了，盟族领导都送了花圈。我们几个为妈妈立了一块石碑。

后来，我们也就从这座碑开始，为凤仙额吉拍了一部纪实片，片名就叫《额吉的碑》。

今年春节以前，我的朋友玉峰向我约稿，让我写写当年采访孤儿进入草原的事迹。我把报告文学《额吉和她的孩子》找出来，重新阅读，阅读中又一次和孩子、和凤仙额吉见面，我的感情重新陷入悲痛之中。

凤仙，孤儿们的好妈妈，草原上慈祥的老额吉。你是一个普通的人，又是一个伟大的人。你是蒙古族妇女的代表，也是全人类的所有母亲共有的典范、母爱的化身。

锡林郭勒草原上的凤仙额吉，安息吧！我和我的孩子们一样，守望着墓碑，永远把你怀念。

四十春秋话亲人

陆飞

这个长得亭亭玉立，十分俊俏的姑娘叫乌兰，虽说年已 40 岁，但风采依存。

采访乌兰很不容易，几经周折才找到她。

她腼腆地一笑，面露窘意。

“说一下我知道的事吧！”乌兰说道。

她，现供职于呼和浩特市电影公司，是做检片工作的。检片，是在电影放映前，对轧片、划片、断片等进行检查和修补的。“阿爸和阿妈待我恩重如山，我太感激他们啦！”乌兰说。

小时候的事乌兰已记不起，但她感到奇怪的是，脑海里经常出现高楼大厦的影子。

一次，上小学的乌兰去同学家玩耍，有人问：“你长得像南方人？”乌兰吃了一惊。

上初中时，一位同学说：“你是抱来的孩子……”吃饭时，她就这事儿问了阿爸和阿妈，她们什么也没说……

一天，乌兰淘气时阿爸骂了她几句。尔后，乌兰翻开户口簿，发现她的出生地一栏里填着：上海孤儿院，曾用名一栏被笔划得很深很深、模模糊糊。她当时感到很自卑，但一想到父母的恩情，她不敢胡思乱想了。

久而久之，乌兰的身世就不算什么秘密了。

一次，乌兰听二大爷家的姐姐讲，当时，乌兰的阿爸想要一个男孩，可他转到一小女孩身边时，女孩朝他笑了笑。算是缘份，他抱走了乌兰。当时，乌兰头发黄黄的，肚子特别大，大夫一摸就知道她肚子里有虫子，服药后，她拉了三堆虫子。

后来，乌兰听旁人说，她们这批孤儿有二百余人，个个是大肚子，瘦得皮包骨，大夫给做化验时，在耳朵上取血都困难。这些孩子全住进了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当时，管理的非常严，确认夫妇双方无生育能力，方能抱走孩子……

四岁那年，乌兰得了麻疹，她高烧体弱走不了路，阿爸、阿妈成宿地抱着她。

有一回，家属院的孩子说她：“你是要来的，不是生的。”这时，一些阿姨站出来说：“别听他们瞎说，抱的孩子爸妈能对你这样好吗？”

乌兰的养父母都是蒙古族，原籍哲盟。父亲在 1946 年就参加了解放军，1953 年来到呼和浩特；母亲原在呼市一家毛纺厂工作。退休前，他们都是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职工。

乌兰永远不会忘记那个令她心惊肉跳的年代。“文革”期间，阿爸被揪斗，阿妈进了“学习班”，家中只剩下了她，最可怕的是，她的家被撵到了医院的太平房旁。她满不在乎地说：“半夜起来看死人是常事。”

乌兰上中学是在呼市五中，老师对她挺偏爱。毕业后，按独生子女可以留城的政策，她未下乡，1976 年被分配到呼市齿轮厂当工人；1980 年调入呼市电影公司，她曾当过打字员、保管员、统计员。1985 年，乌兰想学点技术，当上了检片员。多年来，虽说工作平庸，但她从无差错。

提到乌兰的生活，自然要谈到她的家庭、婚姻。

“婚姻问题不想让你们写。”乌兰显得踌躇。寂静片刻，她才说：“谁没个家呢，说说也无妨！”

乌兰 22 岁就结婚了，是按父母之命找的丈夫。一次，男友送她回家，阿妈悄悄地跟他说：“……她身边亲人少，要好好对待她。”

婚后，她生下两个儿子，日子过得也算美满……

或许，是命运的挑战，她们结婚七年后离婚了。这年，乌兰 29 岁。无法说明什么原因，乌兰含着泪打个手势不愿说了。

过了一会儿，乌兰还是流露了几句。

我一次，丈夫骂乌兰：“谁知道你是啥人生的呢！”乌兰气得伤心、落泪……最后，他们分道扬镳了。

离婚后，社会舆论压得她抬不起头来，她带着两岁的小儿子住进了办公室。后来，阿爸、阿妈把她们母子俩接回了家。

这次，对乌兰触动最大，她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是爸妈再次收留了我，亲生的父母也不过如此。”

10 年后，乌兰再婚了。丈夫在内蒙古某机关工作，他是在几年前丧偶的。现在的一家人，互尊互爱，非常和睦……

乌兰的父母皆年逾古稀，她说：“老人给看孩子，我每月还去‘搜刮’他们。不管谁说啥，我也要给他们养老送终……”

她性格活泼，喜欢唱歌，业余时间爱打羽毛球、篮球、乒乓球。

乌兰——蒙古语为红色之意，我们祝愿她过得红红火火。

（原载 1996 年 5 月 23 日《内蒙古日报》）

华昆的抱负

陆 飞

瞧，这个颇具学者风度的青年，就是当年从上海来的孤儿华昆。他今年 37 岁，1.84 米的个儿，长得仪表堂堂。

经许多人介绍，我才知道他是姓他母亲的姓。我找了几次才找到了他母亲的家。

华惠佩老人年已 78 岁，原是内蒙古一家大医院的妇产科主任，从医 40 余载。或许，她不知道我采访华昆的事，一说是记者便勾起了她对往事的回忆。老人从另一间屋里拿过一个小凳说：“这是华昆当年坐的，到家来时，他很小很小，坐的凳子也比别的孩子小得多……”

华昆，37 岁（1959 年生）。他现在在内蒙古医院附设卫生学校任英语教师，他曾成过家，另有居所。

他住二室一厅的楼房，暂时孑然一身。室内显得零乱。华昆很健谈，他说：“听说过过去的一些事，现在的父母对我格外的亲，没必要去过问太多，我认为这不算是个问题。”

他说他记事时母亲就挨整。现在的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部的楼，那时，他们母子俩常常在里面搬来搬去。开始住的是三楼，后来被撵到一楼、病房、楼梯角……父亲也因挨整，长年在外回不来，每年探家一二次，只有母子俩相依为命。

华昆的母亲是江苏省无锡市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同德医学院（现上海第二军医医科大学前身）。毕业后，她曾在上海等地工作。1949 年，她参加了革命，支边到了辽宁的大连，后又到呼和浩特。可以说，她为内蒙古医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献出了毕生精力，和乌兰夫、奎璧、王铎等领导人很熟悉。然而，一场浩劫她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走

资派”，关进了牛棚……当然，她的掌上明珠——华昆也遭了殃，他的姥姥没少照顾他。

华昆的父亲是唐山市滦县人，早年在南开上中学，后考入燕京大学（今北大协和医学院预备班），三年后又上协和医学院（当时的世界三大医学学府之一）。抗战时，华昆的父亲在贵阳参加了抗日救护总队。国共合作期间，曾随军去缅甸抗战，任军医处处长。解放前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了大连医学院的创建。50年代后期，他戴上“右派”的大帽子，“文革”中又备受折磨……

1977年，华昆的父亲离休后回到了呼和浩特（曾任呼市政协常委）。这个破碎的家，总算捏合在一块啦！

父母的厄运给幼小的华昆带来的是灰色的童年。他上小学时，就遭辱受欺，被视为“黑崽子”。在他长大一点时，人们老说他“长得像外国人”。华昆诙谐地说：“那会儿，我就当开玩笑来理解。”从一至六年级，华昆在呼和浩特市南马路小学就读，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上中学时，华昆的母亲费了好多的心思。按成绩他能到一中或二中就读，可最后母亲把他送到了十七中。他说：“母亲是为我的前途着想，十七中工人子女多，好处事……”

“那时的小伙伴有的至今关系还不错，还有的是把子兄弟呢！”华昆的眼睛有些湿润。

华昆上十七中时体质非常弱，为此，母亲省吃俭用经常为他做些好吃的……

中学毕业后，他当了半年多的义务教师。

1977年高考，他想报医学、考古专业，可“教会学校”出身的母亲（精通英语）主张他学英语，娘俩想的不一致，耽搁了几年。此间，华昆收到过内蒙古警察学校、包头铁路技术学校等寄来的《入学

录取通知书》，但他均未赴校。他想，母亲呕心沥血把我抚养大，我不能伤她的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搞经济建设就必须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精通英语就是非常重要的了。这时，他才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决定自己前途的选择，听母亲的话学英语。

最后他终于在 1980 年，考上了呼和浩特师范专科学校的大专班，学英语专业。

1982 年毕业后，他被分到内蒙古医院附设卫生学校工作至今。

14 年来，华昆在工作上很有建树。1988 年 7 月，内蒙古中专外语教学研究会向他颁发证书，评审认定他为第一届年会提交的《关于对中专外语教学改革的几点体会》“具有一定水平”。1989 年，他被校长聘任为教育组组长。1990 年 12 月，他被评为内蒙古中专教育研究会先进工作者。1992 年 5 月，华昆参加了由九江医专卫校社科系举办的“全国中等卫校英语教学讲习班及英语教学经验交流会”。1992 年 10 月，他撰写的论文《英语教学中几个关键问题的改进尝试》，在首届中等医学教育论文评选中，被评为优秀论文。

1982 年 9 月，华昆还参加了北京语言文学自修大学中文专业的函授学习，三年后获得《结业证书》。1987 年 9 月，他在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进修一年。

“虽然对专业不太感兴趣，但工作从未马虎过。跟领导对着干的事也有，对的咋都行，不对的怎么也不行！”华昆说话时态度挺坚决，他的性格很倔强。他不愿搞“人际关系”。他说过去周围许多人不知道他是谁的儿子，他很少向别人表白自己的父亲、母亲是干啥的。他现在的职称是助理讲师，他认为自己应该当讲师或高级讲师，为内蒙古的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华昆于 1984 年结婚。他说：“原妻也是个好人，拆散家庭的‘六

种条件’，对我们来说都不具备，但人各有各的志向……”1992年他们分手了。华昆说，他非常疼爱孩子，现已10岁的女儿跟她妈妈过。华昆现在的女朋友在一家大企业工作，两个人相处的不错。

1996年3月，他参加了《内蒙古中专英语统编教材》一书的编写工作，该书即将出版，今年9月份开始使用。“工作太忙，只顾各类事，把老人们冷落了，尽管在感情上贴得很紧……”华昆感到很内疚。

华昆说二老（父亲现已83岁）知情达理，对他感情颇深，把他培养成才。他现在用的价值8000元的个人计算机，是老人们给买的。他说：“二老每人月收入都在八九百元，不存在经济困难，只求他们健康安乐。”我感到了华昆的一颗拳拳孝子心。

华昆爱好摄影、画画，祖国的三山五岳他都去过，他的钢笔字写得也挺漂亮。

（原载《内蒙古日报》）

“沪娃儿” 赵凤英

陆飞

赵凤英，41 岁，如今在呼市民族服装厂生产车间当师傅。

赵凤英非常忙。去见她时，她正在三楼车间赶活儿。厂方规定：非车间工作人员谢绝入内。无奈，我求门卫跑到楼上把她喊来。她有点紧张。当听完我的“游说”后，她表现得很坦诚：“不错，是这么回事。”接着，她挺为难地说：“真对不起，车间没地方呆，只好让您在楼下等一会儿，再有 40 多分钟我的活儿就完了。”说完，她大步跑上楼去。

就在我“站岗”时，厂党支部书记马艳芬回来了，于是，我被请到她的办公室。片刻，她又找来了赵凤英。

马书记说：“赵凤英是我们厂的生产骨干，曾当过多年的生产组长（管理 20 多人）。1993 年，她获过厂长特别奖，并连续两年受奖励晋级。她的班组曾连续三年被厂里评为先进生产班组。赵凤英特别孝敬老人，去年，她母亲病重，她请了 4 个月的长假，去给老人陪床，按厂规她丢掉了生产组长的‘桂冠’。上班后，她当了普通工人，但态度很端正，叫干啥就干啥。她每天坐公共汽车上班从不迟到……”

赵凤英原本叫蔡凤英。“文革”中，她的养父被迫害致死，之后母亲改嫁，她改姓了赵。

养父叫蔡博纯，哈尔滨人，养母叫杨秀娟，吉林省人，他俩均是 1958 年支边来到呼和浩特的，赵凤英的养父原是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养母在住院处工作。

赵凤英对养父母的养育之恩万分感激。当话题涉及到她养父时，她的眼睛立刻湿润了。1966 年 8 月 15 日（后称医学院“8.15”事件），她的养父——被打成了“黑帮”的蔡博纯，让造反派们和一些不明真

相的大学生，揪到内蒙古医学院的“小主席台”上批斗……一场摧残后，年逾半百的蔡大夫一头倒在了炕上。他因不能排尿住进了本院内科病房，他的肾脏全被打坏了。13天后，蔡博纯含冤离开了人世（1978年平反）。

养父去世后，她们母子俩背着“黑锅”度日，很快就被从教授楼撵到了平房住，这一年，赵凤英才10岁……

小学时光，赵凤英是在呼和浩特南马路小学度过的。一次，学校包场看电影，在入场时有人将她拦住还打了她，说她是“黑崽子”不准进去看电影。后来，有人说“她是孤儿院里的孩子，不是蔡家生的……”这之后才无人打她，她也能看电影了。

赵凤英听养母说：“那天，母亲去医学院的孤儿院想挑个孩子，恰巧，我跑出来了，当时我才3岁。老师说‘这就是你妈’。在20多天后，我被领回了家。”后来，养母还告诉她，她刚进家时，用标准的上海话说妈妈切菜用菜墩子不对，应该用大板子。

赵凤英到蔡家后，养父母对她非常宠爱。每到星期天就领她去公园玩。那时，她又黑又小又瘦，养父母寻着法子给她做好的吃。她高兴地回忆说：“在60年代时，我们家也从未断过苹果、点心之类的食品……”她说养父特别关心她的成长，在墙上划了一道道儿的杠儿，每隔几日就带她去杠儿前比一比，看一看长高了没有。平时，父母吃粗粮她吃细粮，每天都喝牛奶，生活很幸福。她说，那时养父的月工资为155元（副教授级），养母的月工资为45元钱，每月给养父供应90%的细粮，还供应几条好烟。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她感到分外自豪。赵凤英含着泪水对我说：“如果不是那场浩劫，养父还健在的话，也许我这阵儿……”

赵凤英刚上一年级时，学习不太好，养父就把着手教她。养父离世后，养母担心赵凤英的前途受影响，恐其“黑锅”背不到头，1969

年，她带着赵凤英改嫁到呼市旧城的赵家，从此，蔡凤英改名为赵凤英。

门庭换了，赵凤英也由南马路小学转到玉泉区石头巷小学就读。她说自己学习挺好，数学经常得 100 分，语文稍差点，是因为贪玩儿的缘故。

一提到她的童年，赵凤英的泪水就流了下来。她说养父的死对养母是个沉重的打击，对自己也是灭顶之灾。她十二三岁时，就会做家务活儿，担水、劈柴全靠她。1973 年，她的继父也病逝了。她擦一把眼角的泪水说：“我的命苦，不如乌兰和华昆他们（本报曾报道过），人家父母都在，可我呢……”

念完小学后，赵凤英考入了呼和浩特第四中学，于 1973 年初中毕业。待业了 3 年，她被石头巷街道办事处分配到呼市民族服装厂当学徒工。她一直在车间工作。曾当过 8 年的生产组长，是生产骨干分子。

赵凤英进厂时，履历表上父亲一栏写的是赵某某，工人，贫农……一位管人事档案的女干部火了，说赵凤英填写的不真实（女干部的丈夫在内蒙古医学院工作，他知道赵凤英的身世），非让她写上在蔡家的那段历史。政治问题，非同小可，气急之下，赵凤英在自传栏里清楚地写上：“我是南方来的孤儿，是共产党把我培养大的……”

赵凤英于 1979 年结婚，丈夫是呼市锅炉厂政治处的干部，他们的儿子现在呼和浩特市二中高一念书，一个十分美满的小家庭。她说这么多年夫妻俩从未吵过架，恩恩爱爱。前不久，丈夫拿着报纸对她说：“你看，孤儿都长大了，生活也不错，你也挺幸福……”

去年，她的养母患心脏病住进了医院。老人家病很重，大小便不能自理，赵凤英和丈夫不分昼夜地护理，直到老人去世（享年 75 岁）。

下班的铃声响起，仅一个小时的采访结束了，赵凤英似乎还有许

多话要说……

(原载 1996 年 7 月 18 日《内蒙古日报》)

九十九名孤儿和他们的保育员们

齐林梅

1960年5月25日，从上海开出一列火车的一节包厢里，坐着一批不同寻常的旅客，他们中最大的只有6岁，最小的仅几个月。在这个特殊的车厢里，充满了大小孩的嘻笑声和小小孩的哭闹声。同时，还有30多个工作人员走马灯似地为这99名小旅客喂水、喂饭、把便、洗尿布，无微不至地服务着。这99名特殊的小旅客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政府从上海社会福利院接回的第一批孤儿。

当年曾亲手保育过这批孤儿的保育员马玉珍，向记者讲述了36年前那感人的一幕。

当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为了使那些嗷嗷待哺的孤儿们健康幸福地成长，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的乌兰夫代表内蒙古政府接受了上海等地的3000名孤儿。这99名是第一批接回的。

接孤儿的工作团是由呼市卫生局、呼市托儿所、呼市医院等单位的领导人、医护人员和保育员组成的。

当年曾任呼市托儿所保育员的景秀英担任了第一次接孤儿的重任。在车上，景秀英由于日夜照顾小孩过度地劳累和不适应南方水土，患上了急性肠胃炎。尽管身体不适，她仍一手捂着肚子，一手忙着看小孩，直到6天后这批孩子顺利到达呼市。景秀英见到呼市托儿所的领导人只说了句“我身体不争气，没很好地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后，便休克在火车站。

这99名孤儿全部被保育在呼市托儿所。马玉珍回忆，这批孩子来时都是头大、肚大、腿细，额头上爬满了瘦得暴起的青筋，穿得全是政府给买的清一色的紫红色的新绒衣、绒裤，每个小孩还有一套里面崭新的花棉被。

接纳这批孩子后，保育员们便三班倒 24 小时照料着孩子们。当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很多人吃玉米面都很难吃饱，更谈不上吃白面、大米了。而这些孩子的一日三餐全由保健医给安排食谱，牛奶、白面、大米、肉、蛋等营养丰富的食品，需要什么就安排什么。

孩子刚来时肚子像坛子，常喊肚痛。保健医生给他们吃了驱虫药后，他们开始便蛔虫，有的还吐蛔虫。孩子们经一段驱虫治疗后，他们的身体状况明显好转了。

这些孩子说得全是上海话，保育员们面对叽哩咕噜的南方方言如听外语；孩子们听着比他们都土的北方话更是一句也不明白；保育员只好凭着手势料理着他们的吃喝拉撒睡，并一个动作一句话地教他们说北方话。

现年已 67 岁，在家安度晚年的马玉珍，当回忆到那个当时才只有 5 个月的最小的女孤儿时最动情，她喃喃自语道：可惜我没记清那个孩子的名字，我的奶女儿今年已 36 岁，她也当了妈妈了吧？

她说：那个女孩来时肛门外脱，身体状况极差，经保健医生多方治疗仍不见好转。此时，她吃的愈来愈少，保健医生对此一筹莫展，束手无策。

当时正在哺乳孩子的马玉珍，见此情景便承担起了这个孩子的哺乳任务。她把其中的一个奶给这个孩子吃，另一个留给她的儿子吃。以前两个奶都吃不饱的儿子，现在吃一个奶后更饿得哇哇乱哭。马玉珍便给儿子买了奶粉补充。马玉珍说，当时困难时期奶粉不是纯奶粉，里边和的大多数是玉米粉。就这样，孩子经马玉珍一段时间哺乳后，奇迹出现了：原来外脱的肛肠渐渐恢复回去了，小脸也有了红润，身体一天比一天强壮起来。医生见此情景激动地拉着马玉珍的手说：“母乳的神奇有时是医药不可达到的，这孩子多亏了你这救命的乳汁！”

当年曾任呼市育婴院（呼市托儿所承接了这批孤儿后又叫呼市育

婴院）院长、原呼市医院副院长的李立，今年已 78 岁。她是 1938 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战士。她说：“对这批孤儿我们非常重视，特别是对孤儿的认领工作更是把关非常严。当时领养孩子的条件很多，第一必须是革命家庭，且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第二是经医院检查确认没有生育能力者，而且领养人必须持有当地政府的介绍信，并经当地公安局、妇联、居委会调查了解确认其具有抚养孤儿的能力时方才准许领养。”

接了那 99 名孤儿后，又断断续续从上海等地接回了一些孤儿，他们按被接回的时间分别取了春蕾、春花、迎春、夏霞、夏福、秋幸、秋菊、冬梅、冬松等名字。

当时接回孤儿一事在内蒙古特别轰动，人们闻讯后从四面八方来领养孩子。

在保育员的精心护理下，这些孩子与保育员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新妈妈、爸爸来领养时，他们仍抱着保育员的腿哭喊得难舍难分。

1962 年初，这些孤儿被内蒙古的各族人民相继领养。

当时呼市政府和托儿所对认领孩子做了详细的登记造册。之后，保育员们按这些册子对领养者进行家访调查。马玉珍说，调查结果令他们非常满意，家长们都像亲生骨肉一样对待这些孩子。还有一些领养了年龄较大懂事一点的孩子的家长，为了不让孩子周围的人知道他们的身世使他们生活伤感，有的竟几次搬家换环境。

忆起 36 年前那感人的一幕，马玉珍老人的脸上溢满了幸福。她说：“那时我们保育员们没有上下班的概念，加班加点地照顾着这些孩子们。当时我还被市政府评为先进工作者，一尺大的照片被展在市政府的光荣榜上。”

马玉珍感慨万千地说：“这批孩子尽管没有了亲生父母，可他们

却没有失去父母的慈爱和党的关怀。在那么困难的时期，孩子们能幸福地成长，全仰仗了社会主义好，托了共产党的福。”

那批孤儿现都已进入了不惑之年。近年来，很多孤儿前来拜访当年呼市育婴院的老院长和保育员。现在，孤儿们有的当了人民教师，有的成了有建树的科研人员，有的担任着重要部门的领导人……他们都生活的很美满幸福。

一位名叫春花乌兰的孤儿对记者说：“我的名字是一个组合名字，春花是呼市托儿所给起的，乌兰是我的蒙古族养父母起的。这个名字，是为了让我不要忘记党、内蒙古政府和乌兰夫。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哪有我幸福的今天？所以我给儿子取名叫‘党恩’。”

“我最爱唱《唱支山歌给党听》一歌，‘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这首歌最能表达我的心声。”春花乌兰说。

（原载 1996 年 11 月 7 日《内蒙古日报》）

老天无情人有情

——三个残废孤儿的命运

冯江

1966年10月20日，几经周折我终于在锡林郭勒盟民政局福利院见到了这三姐妹，老大叫国秀梅，老二叫国秀琴，老三叫国秀霞。1959年，乌兰夫把上海市等地的3000孤儿接到内蒙古安家落户，这三姐妹就是其中的三名残废孤儿。据上海保育员们介绍，这些残废孤儿，都是生下来后就被遗弃在产院的。上海育婴院将她们收容起来进行抚养，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偏偏老天无情，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又使她们陷入饥饿、疾病的困境。是乌兰夫把她们接到草原上来抚养，再次挽救了她们。

当她们来到锡林郭勒的时候，国秀梅、国秀琴刚一岁，国秀霞出生才几个月。由于她们的残疾，原锡林浩特市阿那旗民政局承担起了养育责任，并且给并无血缘关系的三个孩子起了名，都姓国家的“国”。民政局先后雇用了两位保姆抚养这三姐妹，其中一位阿姨一直把她们照顾到出嫁、成家。

我十分幸运，见到了这位当年抚养孤儿的老妈妈。老人今年已是72岁高龄了。这位把三个汉族残疾孤儿带养成人的老妈妈，是一位朝鲜族人，名叫芮顺姬。她的老家在韩国汉城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日本侵朝，她13岁时与村人一起逃难来到了中国东北。来到中国后，她跟随共产党投入到了艰苦的斗争中。1959年，芮顺姬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着少数民族代表、妇联主任、县人民代表等职务。当与她一起来到中国生产、工作的朝鲜族丈夫去世后（1963年），芮顺姬带着母亲、女儿、儿子来到了锡林郭勒大草原。1964年，锡林浩特市民政局调查街道里的生活困难户，了解到了她的情况。经过严

格的调查、审核、民政局决定把代养孤儿的重任交给芮顺姬。

三姐妹在不懂事的时候得了小儿麻痹。后遗症使国秀梅右腿残疾，拄单拐走路；国秀霞双腿残疾，架双拐行动；国秀琴虽说不用拐杖，左腿也不灵便，身高不足 1.4 米。然而她们三人一个比一个灵秀，一个比一个能干。由政府出资三姐妹都顽强地读完了中学。目前，老大国秀梅和老三国秀霞已被锡林郭勒盟民政部门安排在盟福利院中工作，成为国家正式工作人员。老二国秀琴在锡林郭勒盟医院当服务员。她们姐妹每人月工资都能挣 300 多元。现在，三姐妹都已经生儿育女，有了自己幸福的小家庭。

国秀梅，今年 36 岁，1981 年参加工作，1983 年结婚。比她大四岁的丈夫名叫王锁柱，是河南人，长得浓眉大眼，干得一手好泥工活儿，又是出了名的老实厚道人。婚后，单位领导人给予他们特殊照顾，他们生了一儿一女，儿子今年 12 岁，刚上初中，女儿 7 岁，在上小学。国秀梅说，她们从小到大吃国家、喝国家，没有为国家作出什么贡献，心里很内疚。

国秀琴，今年也是 36 岁，排行老二，现在与丈夫段福一起在锡林郭勒盟医院工作。他们是 1982 年成的家。她丈夫是锡林浩特市当地人，左臂残疾。听说当年朝鲜老妈妈还不同意这桩婚事呢，她担心本来双腿残疾的秀琴再跟着有残疾的丈夫，生活上会受苦。段福虽然身有残疾却十分能干，总把家整得有条有理。老妈妈现在说起当年的事儿，也不得不信服国秀琴的好眼力。国秀琴只有一个女儿，今年 15 岁，长得十分清秀，高高的鼻梁，大大的眼睛，个子已经 1.6 米多了，很讨人喜爱。国秀琴说她自己非常幸福。在她家里采访时，我发现她并不用拐杖走路，经询问得知，1991 年，在盟民政处、市民政局和盟医院资助下，由专家给国秀琴做了小儿麻痹手术，从那以后，她就能够摆脱用了多年的拐杖，独立行走了。她说：“我真的不知该怎样

感谢政府，感谢共产党呀！”

老三国秀霞，比姐姐们小一岁，她性格活泼开朗，特别爱看书，尤其是小说。她说，她和丈夫都爱干净，脾气很投合，从来不吵嘴，她自己脾气不好，丈夫总是让着她。1985年，国秀霞与丈夫高彪认识、相爱，1986年结婚；丈夫是河北人，比国秀霞大7岁，瓦工手艺特别好。那天我没有见到他们8岁的儿子，国秀霞说他们的儿子很淘气，常常自己就跑到姥姥家里去玩了。她说的姥姥就是那位朝鲜族老妈妈。

三姐妹告诉我，在她们的心中，这位朝鲜族老妈妈就是她们的亲生妈妈。

芮顺姬1964年接受政府交给她的这个任务时，当时孩子们都已经都四五岁了，然而病魔使这三个四五岁的孩子一步都走不了，更是下不了炕。于是她们吃饭、喝水、玩耍，以至大小便统统只能在炕上，是芮顺姬一把屎一把尿把这三个孩子养大。三姐妹回忆到，那时候她们的阿姨很辛苦，但性情十分温和，再苦再累也从不对她们发火，对她们照顾得无微不至。60年代全国粮食困难时期，有时候普通人家小孩儿都羡慕她们是孤儿，吃的那么好。苹果、饼干、奶粉、白糖、蜂蜜，当时人们见都很难见到的食品，民政局都送来给她们吃。就连后来她们学走路用的拐杖都是民政局领导人亲自给送来的。芮顺姬一个一个抱着，一个一个扶着，终于使她们都学会了走路，都能够去上学了。然而老二国秀琴由于双腿残疾架拐走路十分困难，于是从上小学的第一天起，芮顺姬就背着她去。国秀琴告诉我：小时候，民政局常送票来让她们去看电影，开始阿姨背着她，扶着国秀梅，领着国秀霞，再让国秀霞拉上比她们小4岁的阿姨的小儿子，全家一起去看电影。然而，后来阿姨实在是背不动她了，就让姐姐们领着小弟弟，小弟弟扶着姐姐们自己去看电影，阿姨陪她在家里一边干活儿，一边给

她讲故事，从不留她独自在家中。

芮顺姬老人说，姐妹和她的儿子从小在一个炕上长大，一个锅里吃饭，感情特别好。

72 岁的芮顺姬老人说：“我虽然不是中国人，但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我就一定要完成好。对待孩子们我心里始终有一碗平水，觉得个个都是我心头的肉。”

1974 年深秋的一天，是芮顺姬和孩子们永远也忘不了的一天。下午五六点钟，芮顺姬做好了饭菜在等待着孩子们下学回家的功夫，自己去拣引火用的干柳条，不知不觉走近了已经拆掉一半儿的原锡林浩特市蒙族幼儿园院里的平房中，芮顺姬说，当时她听到外面有人喊：“墙要塌了！墙要塌了！”可那时候她发现自己已经出不去了，索性就地坐下。瞬时一堵墙从中间一分两半儿倒塌下来。幸运的是正好没有砸着芮顺姬，却把她半身埋在了土中。这时她清楚的听到孩子们下学回来听说阿姨被压在塌房里又哭又喊的声音。拄着拐杖的孩子们早已失去了理智，不管芮顺姬在里面怎样不停地喊“我没事”，她们冲开了阻挡的人们，一起哭着扑进了塌房之中，如同搭救自己的生母。房子继续倒塌着，孤儿们、芮顺姬和芮顺姬的儿子五条性命眼看着危险在即。幸亏闻讯赶来的人们，及时把芮顺姬和孩子们从塌房中救了出来。当刚被救出来的芮顺姬看到她的孩子们个个被砸伤的样子，心疼地抱起这个，放下那个，最后她找来三轮小推车，可小推车里只能坐下三个孩子，于是她想也没想扔下自己的儿子，把受伤的三姐妹推到了医院里，老大国秀梅和老二国秀琴伤势不算太严重，当时医生就给包扎上药处理了，然而老三国秀霞的左腿骨折了。那天正好是星期六，主治医生休息。芮顺姬又把国秀霞推到了医生家里，一直到半夜一点多钟国秀霞的腿被接上，她才肯让别人陪床，自己回家去看那几个孩子。回到家以后她才发现，已经睡着的儿子半边身子都已青

肿……芮顺姬老人说到这里，忍不住老泪纵横。她说在她心中这些年里早就没有亲生和代养的区别了。

临别时，我为她们母女四人照像留念，看着她们亲热地互相整理衣饰、头发，我不禁感慨万分。这位异乡人，给草原谱写了一曲多么深情、壮美的歌呀！

（原载 1996 年 11 月 28 日《内蒙古日报》）

王娅男的北方情结

齐林梅

照片上的这对母女相依相偎在一起多么亲切，然而，照片上的中年女子与这位母亲却没有血缘关系。这位中年女子叫王娅男，现年42岁，是1960年从上海接到内蒙古的孤儿。照片上的老者，是王娅男的养母，叫李立，是1938年在延安参加八路军的老革命战士。

王娅男是首批从上海接到内蒙古的99名孤儿之一，当年已4岁，李立当时任呼市育婴院院长。

已稍懂事的王娅男，长着一双乌黑有神的大眼睛，高高的前额，浓浓的双眉，特别惹人喜爱。当时李立已有两个儿子，没有女儿，她便怀着为国家分担忧愁和圆有儿有女的梦，领养了王娅男。

从此，王娅男便走进这个革命家庭，开始了她幸福的人生。

现年已78岁的李立仍精神矍铄。她说，收养王娅男后，由于她和丈夫工作都特别忙，怕照顾不好王娅男，就专门雇了保姆。李立说，当时正处在困难时期，雇保姆照看小孩的人家极少，都是自己边工作边照看孩子。

在双亲的精心抚养下，王娅男上学了。

王娅男长得像俄罗斯人，在学校分外招人显眼，顽皮的同学常常指着她喊：“‘小苏修’、‘小苏修’，你是要来的孩子。”王娅男曾为这无法更改的“小苏修”长相苦恼不已，在母亲面前没少流过委屈的泪。李立安慰她：“你是中国人，你是妈和爸最疼爱的好女儿。”

“妈妈，我是要来的吗？”王娅男问。

“是，你是妈妈收养的孤儿，你的亲生父母是上海人。”李立便将王娅男的身世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已懂事的她。此后，王娅男再不为同学们说她是“小苏修”、“你是要来的孩子”而生气流泪了，每当听

到同学说她时，她总是反击道：“我妈我爸特别疼我！”

光阴如梭，一转眼王娅男已小学毕业了，从小就受军人家庭熏陶与影响的王娅男，立志要当一名军人。小学毕业后，王娅男就每天缠着爸爸妈妈要参军，可爸爸妈妈希望她上大学。最终父母执拗不过，14岁的王娅男终于穿上了军装。

10年的军旅生涯之后，王娅男和一位浙江籍战士结为伉俪，并随丈夫一同转业到浙江省临海市工作。

现在，王娅男已儿女成双，在一家公司任职，其丈夫在一家企业工作。她们生活得非常和睦美满。

由于王娅男远在千里之外，记者只好电话采访了她。当她得知记者的采访意图后特别激动，连声说：“谢谢你采访，谢谢你们对我们孤儿的宣传报道。”她说：“在当时国家困难时期，我这个嗷嗷待哺的孤儿能像有妈有爸的孩子一样幸福健康地长大成人，全是社会主义制度好，共产党好，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给我第二次生命的共产党和我的养父母的恩情。”电话采访结束时，王娅男一再嘱咐记者转告其父母要保重身体，并祝母亲健康长寿。

现在家颐养天年的李立向记者谈起女儿王娅男时，仍有一个最大的遗憾，那就是没让她上大学。

尽管王娅男现在已当了母亲，可在李立眼里她永远是个孩子。当谈起王娅男的身体状况时，李立反复向记者念叨着，王娅男身体状况不好，小时候得过肺炎，气管不太好。那时，一到冬天，李立就给王娅男衣服后背缝上一块羊皮来保暖。她说：现在也不知道娅男入冬后气管犯不犯病。

“女儿很孝敬。”李立很知足地说，“娅男很懂事，每四年回来探望我一次，回来时总是大包小包地给我往回带南方的土特产，平时，还经常打电话关心我的身体状况。娅男走时，我又给她带上她一直爱

吃的牛羊肉。”

李立说：“我特别疼爱娅男，一方面是由于她特殊的身世，另一方面是多年来的养育之情已使我们融为亲密无间的一家人。爱，早已抹平了娅男与我们家庭的血缘界线。”

（原载 1996 年 12 月 26 日《内蒙古日报》）

民族团结的赞歌

傲腾

锡林郭勒

一条清澈、蜿蜒、远去的草原河流；

一块碧绿、辽阔、丰美的北疆草原。

1959年，中华大地经历了一场自然灾害，南方的许多孤儿院因食品不足陷入困境。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和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的亲切关怀下，锡林郭勒草原敞开胸襟，用博大的爱拥抱了这些“国家的孩子”。

30多年过去了，这些孤儿的生活成长情况如何呢？我从呼和浩特来到锡林郭勒草原西南部的镶黄旗所在地——新宝力格镇，采访当年那些孤儿的近况。这个旗的一位老领导人向我介绍说，现任旗某文化宣传部门的领导人就是当年上海来的孤儿，你一看就知道，他精明能干，把自己的单位搞得红红火火的。当我用电话说明来意，约他谈谈时，他在电话里笑着说：“你已是要采访的第16位记者了。实在对不起，我是锡林郭勒草原牧人之子，相貌是表，心灵才是本，我的文化修养、心理、秉性都是草原给予的……”

记者前去采访其它孤儿时也吃了他们的“闭门羹”。他们共同的理由：“就是不愿意接受这个‘孤’字，老人不愿听，孩子们也不愿听，我们自己也一样。我们从懂事起就没有感到过孤——我是阿爸阿妈的掌上明珠，在家姐妹兄弟中我是最受宠的，在锡林郭勒草原上有幸福的童年，有我幸福的家，有我赤诚的伙伴，有我豪迈的事业……”这是苏尼特左旗某乡党委书记的一番话。是的，他那黝黑的脸庞，高高颧骨，是地道的蒙古族呵！

看来，岁月在锡林郭勒草原埋没了一个事实，在锡林郭勒偌大的

怀抱里今天随处可找到生龙活虎的新一代牧民，再也找不到当年的孤儿了。真如一位草原老人所讲：锡林郭勒的怀抱里只一个“亲”字没有“孤”字……

幸福的“国家孩子”，善良的草原牧民

尽管当年的这一批南方孤儿，如今不愿意接受或承认“以前的那一段故事”，但我们在辽阔的锡林郭勒草原上寻访时，随处都发现了他们的生活是幸福的。从赛汉塔拉至二连浩特市的公路旁就有好几家，我们的汽车开到一户牧民门前。这一家的女人出来拦狗，我们一看她的外表有一点像南方人，就下车讲明来意，她立即有一点不自然起来，让我们进家。她家很阔绰，三间大北房，大客厅，房间布置、装修都很讲究，屋内现代化的家电、家具都很齐备。女主人叫孟根其其格，丈夫叫巴阿夫，有两个男孩子，两个女孩。沉默了好一阵以后，她很不情愿地用蒙语讲：“你们远天远地来了，实在过意不去，小时候的事我知道的很少。来时我在襁褓中，是我阿爸14年前去世时，给我拿出一个有汉字的布条，说我也是‘国家孩子’，我根本就不信，把布条撕了。我就是现在也半信半疑。我小时候经常听说，这一带牧民如何抚养‘国家孩子’的事，这里的人不叫孤儿，叫‘国家孩子’。人们都说：‘国家的孩子’是周总理、康克清、内蒙古的乌兰夫主席交给牧民抚养的孩子，谁都得在各方面让着一点。那时我总以为说的是别的孩子，根本不知道我也在其中。但有一件事我记得清楚，我小时候草原上大米很少，过年时才给每人供应几斤。牧民拿到大米后都送到我们家，家里人专门做大米饭给我吃，说女孩吃了白净净的大米，长得白净。草原上春夏秋奶多得像水，可到冬天，就没有鲜奶了。这一带牧民家谁的母牛冬季下犊，把牛奶挤下来冻成冰块，不管多远都给我送来。我现在想起我就是有一点特殊……”她的热泪滚下来。停顿片刻，她情绪稳定以后又说：“我们或许是被生身父母遗弃的，但

我们没有被国家、社会遗弃。我在草原、在蒙古族牧民的怀里成长得很幸福。”她抽泣着说不下去了。我们很快换了一个话题，问她现在的生活状况，她用手帕边擦眼泪边说：“这我愿意说，我的生活很好，这房子你们看了，我们还有一处冬营地，也有房舍，有60多头牛，800多只羊，10多匹马，一年卖羊毛、卖肉畜收入约七八万元。我丈夫是苏木人民代表模范牧民，懂汉语懂汉文，能做一点生意。我们十分相亲相爱。这生活还要怎么样？两个女孩在锡林浩特上中专，两个儿子初中毕业后给我们当帮手。将来儿子继承家业在乡下干，两个姑娘在城市，我们老俩口，两头跑。等到孩子把我们这一摊子接过去后，我和丈夫想到上海看看，不为寻根，我的根就在锡林郭勒草原，离不开草原，不喝奶茶头疼，到了城里憋得慌，到上海只是想开开眼界，知道一下生我的地方是什么样？锡林郭勒草原待我们好，不只是对我一个人，草原上的‘国家孩子’都是如此。”孟根其其格一下变得判若两人，话越来越多，脸上现出幸福、满足的笑容。

爱心、孝心以心换心，汉族、蒙族以情结情

春天是草原的收获季节。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小马驹、牛犊、羊羔在“妈妈”的身边撒欢。它们是在庆贺自己的新生？还是讨“妈妈”的喜欢？“羊羔吃奶眼望着妈，养育之恩让人没齿难忘。”这时我们在锡林郭勒采访时感触最深的感受。在这里我们触摸到了心灵与心灵的交换，情感与情感的融合。

在赛汉塔拉人们传颂着这样一个“换腿”的故事：当年，苏尼特左旗都仁乌力吉苏木牧民哈斯巴特尔和妻子色仁杭格拉双双来到旗保育院，本想抱一个男孩子，这时一个年轻的牧民“妈妈”抱来一个大哭大闹的女婴，说这孩子哭个不停，让保育员换一个。色仁杭格拉把孩子抱在怀里，这孩子立刻不哭了。哈斯巴特尔俩口说这孩子和我们家有缘份，高高兴兴地抱走了这个安徽籍的女孩子。南方孩子毕竟

不一样，最不经冻，晚秋她是草原上最早穿棉袄的一个。怕她受冻，色仁杭格拉夜间起来在蒙古包生一次火。孩子4岁时得了肺结核，哈斯巴特尔骑马背着姑娘到300多里以外的集宁市住院治病，当爸爸的就在病床边守了一个月。肺结核好了没多久，5岁时，小姑娘的双腿瘫痪了，妈妈把瘫痪的姑娘放在勒勒车上，从苏尼特草原到达尔罕草原、阿巴嘎草原转游，寻觅民间医生为姑娘治病，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一个民间针灸医生，说可以看好。真是一声春雷，她把随身的值钱东西都卖了，买了当时最好一条香烟送给医生。医生在姑娘身上扎针，最后把姑娘用皮被子包起来出汗，说三天不能动弹，动了把汗闪回去了，病情会更加重。妈妈紧紧盯在姑娘身边，给她喝水、咀嚼炒米喂她。三天后，姑娘的腿奇迹般好了。7岁时送到学校，姑娘在全旗女子长跑、短跑赛中都得了第一名，她的纪录至今没人打破。1990年这姑娘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在全旗自行车越野赛中得了第二名，人们称她“飞毛腿”。

“这飞毛腿是妈妈给我换的。”现在已是苏尼特左旗民委干部的阿拉坦图雅这样说。“妈妈当时背着我到处给我看腿病，她老人家见菩萨就磕头，见医生就求药，说如有可能把我这双腿换给我姑娘吧！那时我已5岁多，都听懂了。不是迷信，是感情。现在我妈妈得了风湿病，动弹不方便了，完全是为我累下的。我现在受苦受累孝敬老人是理所当然。”阿拉坦图雅的丈夫叫达布希拉图，是该旗协作办副主任，俩个人月工资合起来也不到千元，负担两个孩子、两个老人共6口人的生活够紧的。他们俩为了照顾好两位老人把他们从乡下接到县城里，在身边照顾，这还不放心，专门给两位老人雇了一个小保姆。

这样孝顺的国家“孩子”，在辽阔的锡林郭勒草原上太多了。苏尼特右旗查汉敖包苏木牧工人额定其木格，见到我们时，把层层包扎珍藏的养父“荣军证”拿出来，擦着眼泪说：他老人家，戎马一生，

没有过几年好日子于 1974 年去世。那时我们生活没有这么好，如果他老人家活到今天，我一定让他坐坐火车，乘乘飞机，去逛北京、游上海。我现在想到这些心里堵得很。二连市粮食局干部巴德玛说：“我虽然从血缘讲是汉族，但生活习惯，受的文化教育是蒙古族的，我当工人时填写登记表写蒙古族，大家都承认我是蒙古族。我爱人是汉族，生下的孩子是蒙古族。哈哈，乱套了，就这么乱套吧！最后就没有什么这个族、那个族，大家都是团结族。”

我在采访这批孤儿时，常常问他们有什么烦心的事？他们异口同声说：现在一切都好。一位孤儿说：要说烦的怕的事嘛，就是填写登记表、履历表什么的，每当这时它就勾起我们童年的记忆。我来时已 5 岁了，朦胧地记得一点，我在上海时，姐妹三个，姐姐叫陈亚琴，我那时叫陈亚萍，住在江边上，经常坐船进城。我被遗弃过两次，第一次我让人给送回去了，第二次在商场“走散”，就这样进孤儿院，后被送到内蒙古，被一个老干部、烈士的父亲抱养。从此，我就像掉进蜜罐里一样。我是爸妈心肝，我幼小心灵上的伤痛抹平了。后来我结婚，丈夫是倒插门的女婿，我们四人一起生活。我伺候两位老人，并为他们养老送终，算尽了孝心。现在家庭生活也美满，丈夫是市工商局副局长，孩子争气，学习好。前年还到上海专门去看一次，在黄浦江边转好几趟，上海人生活和我们没两样。麻烦得就是一到登记，填写什么籍贯，什么民族，就让我心痛一次。籍贯应写上海，可是我是蒙古族，这不能变。我不是喝黄浦江水，而是喝锡林郭勒河水长大的。我的一切都融在这里啦，我们这种蒙古族、汉族的情结，永远解不开，而且越来越牢固。

（原载 1996 年 5 月 31 日《内蒙古日报》）

母亲的丰碑

郑少如

我带着《母亲的碑》电视纪实片摄制组到锡林郭勒草原上，想以张凤仙阿姨为中心，再拍摄一些其它孤儿在草原上生活的情景，可当我们的镜头对准他们时，母亲不高兴，儿子不愿意。他们说我们本来就是亲亲的母亲，亲亲的儿子。整个草原上写下一个大大的“亲”字。他们一直在母亲怀抱里长大。当他们初踏草原时有的一两岁，有的三四岁，有的才几个月，是草原的母亲屎一把、尿一把把他们养大。这里就是他们的家，这就是他们的亲妈妈。草原的奶、草原的风养大的都是草原上人。他们的脸上一个个丰满壮实，哪里能看到江南娇小白嫩的身影！北疆南国、蒙古族——汉族，在这里血肉相溶为亲亲热热的大家庭。第二代，第三代，草原抚育着他们，他们又在建设着草原。

在这三千孤儿的养育之中，最感人的是锡盟镶黄旗的张凤仙阿姨。她抚养了六名上海汉族孤儿。20多年来，她含辛茹苦地把这些孩子养大了，可是她自己却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多病缠身。她动过四次大手术，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胆结石、糖尿病、关节炎，最后由于食道癌、高血压并发而过早地离开人间。为了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几个孩子商量，打破蒙古民族不立墓碑的习惯，一定要在万里草原上立一座石碑、让千百万草原人民，让世世代代的子孙都记住她的恩情，都学习她的精神，永远纪念这位伟大的母亲。

这件事感动了我们，遂成立了摄制组，要真实地记录下这一幕幕动人的情景，拍摄成电视纪实片《母亲的碑》。我也是一位母亲，在张凤仙阿姨的面前，自愧不如。我含着泪一幅幅地剪出了这部片子，剪出一部人间真情。

草原的仲秋十分娇美，像个待嫁的少女，天青似水，云白如玉，

花团锦簇，万里碧草像大海一样起波翻浪，我们仿佛置身于诗画之中。然而，草原上的故事比这诗画更动人。

我们到达镶黄旗，孩子们已经为母亲刻好了墓碑，汉白玉石碑上刻着“母亲张凤仙之墓”几个苍劲的大字，下面是儿女巴特、黄志刚、党玉宝、毛世勇、其木格、高娃、张淑英的名字。这一家人虽然七八个姓，但亲情却浓于血、烈于火……

立碑的那一天，他们清晨五点钟起床，到外面采了一大堆鲜花，扎了两个大大的鲜花花圈，每人手里还拿着一束鲜花。老人生前爱吃的东西满满摆在墓前。老人的儿女和孙辈们恭恭敬敬地站在墓前行礼，头抬起来的时候个个都泣不成声。

“奶奶，我们回来看您来了，奶奶，我们想您呀……”撕心裂肺的“奶奶”声把大家的心都哭碎了。就连我们这些摄制组人，也都是热泪盈眶。是啊，不仅爸爸妈妈得到过老人家的温暖，这第三代的身上都有老人的泪珠和汗水。

“妈妈，妈妈！生前您从不让我们叫您妈妈，您说我们是周恩来、乌兰夫送来的党的孩子、国家的孩子，说让我们长大到上海再找生我们的妈妈……不！不！您就是我们的亲妈妈！妈妈，妈妈……”

这撕心裂肺的“妈妈”声，就足以表明了一切。如果不是那一滴汗一滴泪地把他们养大，是不会有天下难寻的这种深厚感情的。

“今天，我们不经您老人家的同意，在碑上郑重地刻上了“母亲”二字。您就是生我们养我们的亲生母亲！”

“母亲，您老人家放心吧，我们都长大了，都会按照您的教导去做人，去做事，不会对不起您的。母亲，安息吧！”

孩子们虔诚地为母亲的坟头添土，把鲜花敬献在母亲的墓前，把鲜花撒在母亲的坟上……

太阳照在洁白如玉的墓碑上，母亲像个高大的巨人屹立在大草原

上。

万里草原是这么干净，这么圣洁，只有这一座墓碑立在碧波之中，望着她生活了一辈子的镶黄旗，望着她亲手抚养成人的儿孙。她在风里微笑，她在云里微笑……

到此为她立碑的不仅仅是她的儿女娇孙，还有很多和她儿女一起长大、深深地被她的精神所感动而十分敬仰她的人们。提起张阿姨，锡盟草原人人知道，走到哪都能听到她的故事。

一对普通的蒙古族牧民夫妇，在天降大灾的六十年代，毅然收养了六个上海孤儿并把他们养大；一个没有文化的远离城市的草原上的蒙古族母亲不仅含辛茹苦地养育六个无亲无缘的汉族孤儿，并供两个上了南京气象学院和天津南开大学，送两个参军使之成为锡盟武警部队中校军官和镶黄旗武装部长，支持和鼓励另外两个成为国家正式职工……这里面所包含的民族深情和母子深情，是无法衡量的，也是无法用语言能够说得清的！

孩子们最懂得母亲的艰辛，懂得回报母亲的恩情，所以一定要为母亲立一座丰碑。她的大儿子巴特对我说：“虽然说立在这里的仅仅是一块石碑，但它表达了我们的赤子之心。而立在我们心上的碑，则是永远磨灭不了的。”

孩子们永远记得，是母亲冒着风雪严寒，步行九十里到化德县去给他们背大米；他们初到草原喝不惯奶茶、吃不惯炒米，母亲心急火燎的样子……他们懂得知恩报恩。巴特在南京上大学，一放假便从几千里之外给母亲背回江米，大虾。高娃虽身体单薄，却从北京背回一百斤白面。她扛面从北京挤上火车、到张家口换上汽车到宝昌，再从宝昌到镶黄旗，几上几下，其辛苦劳累可想而知。而当她看着母亲吃上白面馍馍，心里别提多甜了。孩子们参军了，工作了，给老爹道尔基带回来了上国宴的“洋河大曲”，他们的阿爸阿妈是多么的高兴啊！

孩子们还给我们讲起了妈妈对他们的疼爱和他们妈妈的感情。

母亲领回他们六个，缺吃少喝，一份奶食分八份，只盼着道尔基大爷回来带只打的黄羊。有时候大爷带点牧民杀了羊不要的羊下水、羊骨头，母亲赶紧做熟，自己忍着饥饿先把他们喂饱。母亲身子累垮了，到呼市住进了医院，他们又成了没人管的孤儿，只得暂时住到学校，当时处于困难时期，谁也吃不饱。老四毛世勇说：“我们觉得很害怕，又成了孤儿，心里很慌。”母亲总算病愈回来了，他们又有了热乎乎的家，有了疼他们爱他们的母亲。几个孩子商量这回得好好照顾母亲，再也不能让她病了，再也不能离开她了。没吃的，拿什么给她老人家补养呢？他们就偷偷地打死了董老师的一只猫炖了给母亲吃。母亲知道了非常生气，骂了他们一顿。教育他们要正正直直地做人，不能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

母亲太虚弱了，为了给她好好补养身体，几个男孩子商量要到湖上捡些野鸭蛋给母亲吃。上哪儿找船去呢？他们找来牧民饮马的木槽子，几个人坐上划到了湖心岛的芦苇丛里，捡了好多野鸭蛋，高兴地往回划。母亲托着病弱的身子由高娃她们扶着到了湖边。高娃吓坏了。她看见木槽七歪八扭地直摇晃，几个哥哥挤在上边，稍不小心就会翻在湖里。哥哥们危险，高娃刚要喊，母亲一把捂住她的嘴说：“不能喊。你一喊，他们一急马槽就翻了。这湖水深，淹死过牛，淹死过羊，也淹死过人哪。”她跪在地下祈祷，嘴里叨念着：“求佛爷保佑这些可怜的孩子吧，他们活到今天不容易。真要有个好歹我怎么向周总理交待？怎么向乌兰夫主席交待？！”其实最交待不下的是她这颗母亲的心。她眼巴巴地看着孩子划呀、划呀，一下下好像揪着她的心。她的心在滴血。苍天哪，作一个母亲为什么这么难？！“小船”一点点划过来了，她用一颗慈母的心做成心绳，把这些孩子一点点揪啊，揪啊，终于揪到了岸上。她不顾一切地扑上去就打。母亲的爱是用这种“恨”

来表达的。打完了抱住他们就哭，大声说：“天哪！苍天还是有眼，又把这些孩子还给我了。”母亲把野鸭蛋煮好又分给他们吃，可谁也不吃。哥哥给弟弟、弟弟给妹妹，妹妹给妈妈，你推我让，妈妈捧着野鸭蛋哭了……

高娃从南开大学毕业就分到北京协和医院医学研究所，条件非常好。母亲病了，高娃把她接到身边，请最好医生，用最好的医疗条件给母亲治病。母亲手术后，她一口汤一口饭地喂母亲，给母亲梳头洗脸，陪母亲说话，为母亲掉泪。这一切，多像她小的时候母亲为她所做的一切啊！其情其景是这样令人感动！

人们不难看出，在张凤仙额吉的身上集中了中华民族的一切传统美德，纯朴、勤劳、正直、善良、助人为乐……还有伟大的母爱。孩子们瘦弱的生命就是在这母亲温暖的怀抱里一个个长大，一个个成人，一个个成才，一个个成家。她又抚养了第三代，把老二的儿子赫赫带大参了军。孩子们心里明白：她操劳一生，一滴滴血，一份份精神，都化成了我们的今天。我们立一座碑，就是立十座碑，把草原上都立满了碑，也表达不尽我们对母亲的爱，对母亲的敬仰，对母亲的思念，对母亲深深的报答！

让草原把他们养大

邓晓白

养育我的这一片土地，
当我身躯一样爱惜。
沐浴我的那江河水，
母亲的乳汁一样甘甜。

蒙族歌手用草原特有的长调唱起了这首歌，唱起了他们生命中永恒的草原。而当我结束这不同寻常的第一次追踪采访时，我深深感到，同样会用生命中最深情的声音来唱这支歌的，还有 3000 名汉族孤儿。

50 年代末期，经过持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几亿人口处在饥饿的边缘。同样，上海城市孤儿院的 3000 名孤儿，也面临着困境，幼小的生命笼罩在饥饿与死亡的阴影下。

这消息迅速传到了中央，这 3000 名失去父母之爱的孩子引起了中央领导的格外重视，主管妇女儿童工作的康克清同志拿着这份紧急求助的报告，找到了周恩来总理，经指点又迅速找到正在北京开会的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询问内蒙能否支援一些奶粉给这些孤儿。乌兰夫同志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乌兰夫回内蒙古召开区党委会研究决定：把这些孩子接到内蒙来，让草原来把他们养大！

就这样，一批批汉族孤儿，在从内蒙专程赶来的医生和保育人员照顾下，乘坐专门为他们加挂的车皮离开了他们的出生地。幼小的孩子不知道，他们正摆脱饥饿的阴影，在列车驶向的远方，有一片被古人称之为“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正展开她温暖、宽阔的胸怀，等候着汉族孩子的到来；他们同样不知道，那些他们可以称之为“爷爷”的内蒙古自治区领导人，为了他们的到来，开了多次紧急会议，在接收孤儿的医院，专门建立了托儿所。乌兰夫的

大女儿、曾帮助父亲直接参与过接收工作的云曙碧同志，在向记者回忆起当年的情形时说：再忙再累，乌兰夫都会抽出时间去医院、育婴院转一转，指示医护人员精心治疗照顾好这些孩子。

这些孤儿到达内蒙古后，经过一个时期的适应环境和治疗恢复了健康，便开始正式让牧民们领养。于是，那些骑着马、赶着牛车的牧民从茫茫的草原深处赶来了。无需任何说服，任何条件，仅凭着对每一个生命的珍视，仅凭着蒙族人民草原般宽阔的胸怀，这些汉族孩子被裹进了额吉温暖的蒙古袍，成了蒙族阿爸阿妈的高娃和铁木耳。

从此，草原的蓝天白云、阳光月色洒满了这些孤儿的童年。在春的花海，夏的绿浪，秋的金黄，冬的冰雪更迭中，30多年转眼而过，草原母亲的乳汁养大了这些孩子，草原的宽阔也塑造了他们新的魂魄。作家张承志曾这样描述过他的草原“额吉”：“我站在她的影子里看清了所有蒙古草原的女人……，她们像一盘旋转不已的古老车轮，她们像循年枯荣的营盘印迹，在她们酷似的人生周始中，骑手和摔跤手们一代代纵马奔来了。”我好像看到，在这纵马奔来的骑手中，就有这3000名汉族孩子。他们奔向了哪里？现在可好？那一份血浓于水的草原亲情，是怎样牵挂着一颗颗骑手的心？本报将就此作追踪报道。

（原载1996年11月26日《中国社会报》）

草原，不灭的记忆

邓晓白

1961年，尽管全国处于困难时期，在内蒙古各盟市所在地，奇迹一般建起了一栋栋崭新的房子，但这些房子是自治区政府专为那些孤儿创造的。

1996年11月27日，在解放军总医院，王铎老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打开封尘了30年的记忆。老人所叙述的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王铎，当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从延安时代起便和乌兰夫在一起工作，困难时期参与了接收孤儿的工作。

王老回忆说，1960年夏天，乌兰夫从北京开会回来，召集自治区领导人开会，研究接收安置上海等城市的孤儿问题。王铎记得，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很快就指定卫生厅、民政厅等各部门组成了协调小组，由政府拨专款建立托儿所和孤儿院。当时，为了方便接收孤儿，最初的接收站都建在铁路沿线和交通方便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经济相对发达，也可避免孩子少受颠簸。

当数千名孤儿分几批乘车来到内蒙古各地时，自治区领导人分别到各个盟去接孩子。王老还记得，那是个夏秋之交的季节，乌兰夫一再嘱咐负责接收工作的同志，一定要将孩子的身体养好，安全过冬。由于历史的原因，内蒙草原临近解放时疾病流行，许多牧民的家庭没有孩子，因此，这些孩子的到来，受到了乌兰夫的格外重视，也受到蒙古族牧民的热情欢迎。为了孩子的健康，自治区派医护人员带着药物和营养品到上海，对每一个孤儿进行检查，在各方面做了充分准备，使孩子在医护人员照顾下安全到达内蒙。王老笑着说：“不是每个来的牧民都能领养孩子的。当时自治区规定，有抚养能力和缺少后代的牧民家庭才能收养。孩子还真不够分哩！”

每次去北京开会，乌兰夫都要向关心这些孩子的中央领导人，向周总理、康大姐汇报孩子的近况，让他们放心。当时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乌兰夫，不止一次地说过：要在我们的手中，建设一个美好、富裕、人畜兴旺的新草原。一幅未来草原的蓝图早已在乌兰夫的心中形成，而这些孩子将和千千万万的蒙族孩子一起，去实现这个理想。

1961 年从苏联学习归来的乌杰，在北京见到了久别的父亲乌兰夫。在向乌杰介绍完国内形势之后，乌兰夫和儿子谈起了这批孤儿。乌杰记得，除了上海的这批孤儿外，父亲在 1958 年还直接领导接收过安徽的面临饥饿威胁的孤儿。30 多年过去，现在身为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乌杰，在向记者谈起此事，仍能深切地感到，作为国家领导人的父亲，对草原的未来，对这些孩子的未来的关切和期望，这给乌杰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岁岁年年，草原的花开了又谢，这份期望的种子撒向草原 30 多年了。当年内蒙人民接收、抚养 3000 汉族孤儿的情景在老一辈的记忆中还那么清晰。今天，记者踏上西行的列车，去草原，采撷那不曾磨灭的记忆——

（原载 1996 年 12 月 3 日《中国社会报》）

茫茫草原不了情

邓晓白

回忆也许是一扇不轻易开启的门，它总带有许多岁月的重负，而情感就这样沉甸甸地深藏在了心底。

华惠佩，内蒙著名的妇产科教授。1961年，华惠佩从医疗队回到医院时，托儿所的孩子已全被领养走了，只剩下一个病弱的男孩。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喂养不当，大便在孩子的肚子里结成了一个硬包，吃不进、拉不出，眼看就养不活，领养的人家将孩子退了回来。华惠佩走近孩子躺着的小床，心疼地抱起来，幼小的生命也像草原的一棵草呀！华惠佩将这小生命拥进怀里抱回了家。小男孩已经两岁了，瘦弱的身体没法站稳，更别说走路，两岁的孩子不会说话，还拿不住妈妈放在手里的饼干……这个孩子，便是现在已长大成人的华昆。今年37岁的华昆，大学毕业后在一所中专当了英语教师，草原的奶汁，已让他长成一个身高1米84的北方男子汉。

文革开始后，华教授被视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屡遭批判，丈夫也被送到很远的地方改造。小小的华昆跟随着母亲开始了被批斗的生活，也就在那时，华昆从造反派口中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母亲没有给孩子多解释什么，只是让孩子小小的手，紧拉着自己的衣角，无论是挨批斗还是住地下室，都不曾让孩子离开身边。母亲像一只受伤的大鸟，护卫着还不会飞的幼子。“那时候，我们不能回家，每天在不同的地方挨斗，我随母亲住遍了医院那所老楼的所有房间，和母亲相依为命。”华昆的话头在这里长久地停顿了。“父母给了我全部的爱，也教会了我怎样做人。”许久，华昆说。

长大后的华昆，记忆中，只流过一次泪，那是1975年外婆去世。1967年，华昆在北京工作的姨妈为外婆办好了所有进京的手续，操

劳一生的外婆该享享福了。那时母亲已被关了起来，一家又一家普通的老百姓，收容了流浪的华昆。外婆就在这时来到了内蒙，并将户口落在了内蒙。外婆用温暖的手给了华昆一个家，也将生命中的最后8年，给了华昆，给了这个上海来的孩子。华昆点燃了手中拿了许久的烟，透过烟雾，我看到了男儿不轻弹的泪水。

30多年，两代人的爱，将华昆培养成一名为人师表的老师。在一次次婉拒我们的采访时，华教授一再说：“我没有将孩子培养得更好，我没有什么可说的。”看着高大的华昆，搀扶着满头白发的母亲走下一级又一级长长的台阶，像天下所有的母亲和儿子。我们知道，无需老人再说什么。

一走进李子欣老人的家，我的手就被他的老伴拉住了，老人急着让我看女儿给她织的毛衣，买的外套。女儿，是两位老人的骄傲。

早年参加革命的李子欣是蒙族人。1958年，已有了一个上中学的儿子的李子欣夫妇，得知第一批从安徽送来的孩子已经启程，拿着单位开的介绍信，李子欣一早赶到了孩子需要换车的集宁火车站。一上火车，便看见保育员正抱着一个小女孩，稀稀的头发，没有眉毛。李子欣冲孩子张开手臂，孩子竟一点也不认生地搂住了他的脖子。抱着小女孩，李子欣想去找一个大眼睛的孩子，谁知走遍了整个车厢，抱在手里不满周岁的孩子，死死地搂着他，怎么也不松手。小女孩就这样搂着父亲的脖子回了家，成了他们的女儿李侠。

刚来时孩子才10个月，路上受了凉，一个劲拉稀。整整三天，一家人不停地将炉盘上烤热的布片捂在孩子的肚子上，孩子不拉稀了，也能吃奶了。“别看当初孩子眉毛都没有，后来，认识我的人，谁不知道我的掌上明珠是这一带最漂亮的姑娘。”李子欣老人骄傲地说。“我这一辈子，做对了三件事，一是参加了革命，二是将两个孩子都培养上了大学，三是有了这样一个女儿。”

虽然生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质生活贫乏的年代，李侠仍能记得，无论多么劳累，母亲都会省吃俭用给女儿带回一点吃的，尤其是在北方不易见到的时令水果枇杷、香蕉，哪怕只有几个，母亲都会带回来，告诉女儿，这是什么水果，来自什么地方。有一年，在乡下劳动的父亲分到了一斤当年很少吃到的大花生米，父亲舍不得吃，留呀留，一年多过去，回家时，小李侠已认不出分别多时的父亲，但父亲抱起她的神情还那么熟悉，只是那留了一年多的花生，却是早已坏得不能吃了。父母的爱，就这样一点一滴积满了李侠的童年。母亲还记得，有一年葡萄刚上市，自己身上的钱只够买一小捧，母亲用手绢把葡萄包回来给了李侠，幼小的孩子小心地捧着这包葡萄，推开一间间造反派审查过父亲的房门，终于找到父亲时，小小的双手将快捂烂了的葡萄送到爸爸的嘴里，挨斗时从不流泪的父亲落泪了。

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李侠考上了内蒙农牧学院植保系。现在的李侠，已是内蒙国有资产管理处一名优秀的工程师，管理着这片养育了她的土地。“人就像一粒种子，不知会飘落在什么地方，所以，我格外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李侠说。

走进一个又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都像是一本长长的书，而我能写下的，却只是我了解到的千分之一。30多年的情感，沉沉地压在我的笔尖，而对着这些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我常感到语言的贫乏。这份血浓于水的亲情，岂是一个“爱”字能概括得了！静静地拉着他们的手，像女儿一样，我不能再说什么。明天，在我们即将去的草原深处，又会有多少蒙族老人，将他们的儿女送到我们面前……

（原载1996年12月10日《中国民政报》）

唱给母亲的歌

邓晓白

清晨，离开呼市，车向北行。前方是锡林郭勒大草原，当年第一批从安徽、上海来的孤儿，便被安置在这里。

汽车爬上蜿蜒的大青山，寒风裹挟着细小的雪粒，在车的周围翻卷着，当地牧民形象地将它称之为“白毛风”。摄氏零下 28 度的严寒，不一会就在后车窗上结下了一层冰花。

越过大青山，一望无际的雪原仿佛要延伸到天的尽头，昔日的蒙古包已被砖房取代，草原中的羊群像一块块青灰的石头。汽车艰难地越过一处处被风集起的雪堆时，我突然感到一阵犹豫，我该如何去寻访这些孤儿呢？那昔日一座座的蒙古包，一处处炊烟，一片片草海，早已将这些孤儿化作了草原的后代，化作了草原骄傲的骑手。

经过 4 个小时的奔波，顶风冒雪 300 多公里，我们终于到达了赛汉塔拉。

迎接我们的是赛汉塔拉的民政局长温都苏。行前我们知道，他是第一批被送到这里的上海孤儿。

这天已是周末的下午了，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这里的民委干部阿拉腾托娅。在等待的时间里，温都苏始终沉默着，无论我怎样挑起话题，他的回答都十分简单。进进出出的人和他熟悉地打着招呼，用蒙语热烈地聊着天。我静静地坐在一边，我感到，这片土地不仅养育了南来的孩子，像牛羊离不开草地，骑手离不开骏马、草原，早已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了。他们从不愿承认自己是孤儿，因为他们有草原的阿爸、阿妈；草原的牧民，也从不使用孤儿这个词，而称他们为“国家的孩子”。温都苏告诉我，他的名字在汉语中的意思是“根”，也是“最小的孩子”之意。

采访完阿拉腾托娅，我随温都苏来到了民政局敬老院。敬老院里有5位孤老，最大的年龄已有76岁。正赶上老人们吃饭，雪白的馒头随便吃，热腾腾的烩菜，浓浓的砖茶，老人们热情地招呼我们一起吃饭，并告诉我，温局长头几天就来看过他们了。“我们建了个牧场，有了钱，明年老人们的生活还可以改善一些，也可以多为牧民办些事。”温都苏如数家珍地说。这位当年由民政、卫生部门接来的孩子，如今已是赛汉塔拉最年轻的民政局长。历史就这样惊人地巧合。尽管我们早已知道，在今年6月担任民政局长之前，温都苏已在一个环境十分艰苦的苏木——额仁淖尔苏木作了8年的领导工作。这个苏木有68.5公里的边境线，严冬盛夏，他不知走了多少回。当他离开这个苏木时，这偏远、艰苦的地方已通了电，通了水，安装了电话、电视接收系统。不到草原，不知道草原工作的艰苦，做成这几件事，温都苏又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但他说得最多的几句话却是：“我只想实实在在做几件事，不弄虚作假。”关于自己，他始终无言。

草原的夜晚早早地降临，温都苏和局里的领导者，以蒙族的方式迎接我们这些远来的客人，一杯杯白酒斟满了酒杯，温都苏端着酒杯站了起来，按照蒙族的礼节，他该唱酒歌了。然而，温都苏说：“我给大家唱支歌，朝鲜影片《一个护士的故事》插曲。”经历过“文革”的人，大约都知道这首歌，我记得这首歌有一个副标题是《做一名党的忠诚战士》，那近似口号的歌词在现代都市中消失已久，而这发自内心的声音，也已在现代社会中消失已久。“是党培养我成长，我愿做一名党的忠诚战士”。此情此景，这首歌比杯中的酒更让人沉醉。再端起酒杯，我听到了一首熟悉的歌，一首被流行歌手们演绎了多次的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依然是熟悉的旋律，依然是动情的声音，依然是我童年时便熟悉而今已不再使用的歌词：“毛主席呀共产党，哺育我们成长，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温都苏动情地唱

着，和着这歌声的泪水涌上了人们的双眼。我知道，在这反复咏唱的歌中，有温都苏和所有那些我采访过和未采访过的南方孩子全部童年的记忆、成长的经历；我知道，有一种东西，已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有一种情感，也绝不会随岁月的流逝而消融。

“洁白的毡房炊烟四起，我出生在牧人的家里，茫茫无际的大草原，是我生长的摇篮。”温都苏用蒙语为我唱完了这首属于草原的歌，他对我说：“我想说的每一句话，都唱在了这些歌中。我真的没什么可说的，请你理解我。”我理解，我很理解，是“蒙古民族的豪放性格，是能歌善舞的草原人民，培养他成为一名歌手。是生活的经历使他把党、祖国、草原和母亲溶为一体，他经常用歌声去抒发他对母亲的感激之情。”一位在座的朋友也端起了酒杯说：“温都苏，相识多年，我能理解你，无论做什么，对这片草原，你是应该的，应该的。”是的，在这应该中，包含着太深的情感，太沉的责任。草原上的牧民爱说这样一句话：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有一份恩情，该这样回报。

最后，温都苏端起酒，按蒙族的礼节唱起了酒歌：“金杯、银杯斟满酒，双手举过头，……远方的客人，请你喝下这杯酒。”这一杯杯酒，很醇；这一份份情，很真；这一首首歌，很重、很重。是的，对于草原，我们只是匆匆的过客，是远来的旅人，而对于他们，这里，是根！

（原载 1996 年 12 月 17 日《中国社会报》）

草原一代新牧民

邓晓白

牧民们常爱将草原比作母亲的胸怀，因为在她宽阔、温暖的怀抱里，草原的儿女们生生不息。

哈斯巴特尔和妻子色仁杭格拉本想领一个男孩回家，长大放牧也好有个帮手，将来，家里的牛羊，还指着孩子继承。来到托儿所，只见保育员正抱着一个大哭的女孩，保育员说：这孩子太爱哭，怎么哄也不行。色仁杭格拉伸手抱过了孩子，巧的是，孩子马上不哭了。这大约是缘份吧，哈斯巴特尔夫妇也不领男孩了，抱着这个不哭的安徽女孩回了家，取名阿拉腾托娅。

小女孩5岁时得了一场大病，双腿不知什么原因瘫痪了。妈妈拿上了家里所有的钱，将孩子放在勒勒车上，从苏尼特草原到达尔罕草原，找医生给孩子看病。5岁的阿拉腾托娅还记得，妈妈背着她四处求医问药，求神拜佛，只要听到一丝线索，无论多远，妈妈都会带着她去求医。许是母亲的诚意打动了神灵，姑娘的腿真的被民间医生治好了。7岁时，姑娘上了学，居然在全旗女子长跑、短跑赛中得了第一名，成了有名的“飞毛腿”。“这双腿是母亲给的。”托娅说。

阿拉腾托娅26岁时结了婚，丈夫是蒙族人，现在已有了一个13岁的男孩和一个10岁的女孩。阿拉腾托娅长大了，母亲却因劳累过度得了严重的风湿病，瘫痪在床。阿拉腾托娅将父母从苏木接到旗里，虽然夫妇俩的月收入不足千元，却要养活6口人。托娅说：“妈妈是为我累病的，现在孝敬她老人家是应该的。”尽管经济上比较紧，托娅还是为两位老人家请了个小保姆。初中时，托娅便知道了自己来自南方。可她始终觉得，自己的亲人在草原，而这份亲情，早已超越了血缘关系。

从赛汉塔拉继续北行，在去往中蒙边境二连浩特的路上，许多牧民的家庭中，就有这些南来孩子。孟根其其格和丈夫就是牧民。会一些汉文的丈夫，将牧场与生产管理的非常好，家里盖了几间大瓦房，有 60 多头牛，800 多只羊，每年卖羊毛、肉畜的收入就有七八万元。14 年前，孟根其其格的父亲去世时，拿出个写有汉字的布条，告诉她，她来自上海。不愿相信这一事实的孟根其其格撕毁了布条，至今她仍不愿相信这一事实。在草原长大的她不懂汉文，所以将两个女儿送到锡林浩特上中专，两个儿子中学毕业后继承家业回来放牧。孟根其其格说：有机会她会去上海看看，只是旅游。对于目前的生活，孟根其其格非常满意，草原，是她一生都离不开的了。

离不开草原的宽阔，也离不开牧民自由的生活，蓝天白云，碧绿的草海，对于草原的子孙都具有永久的诱惑力。在赛汉塔拉，当我们去采访一位当年从上海来的孩子时，他所在的单位百货公司的同事告诉我们，我们要找的人已经辞职走了，回大草原继续当牧民了。

对于草原的牧人来说，自由也许是最重要的，生命中的草原也是最重要的。这儿浓香的奶茶和手扒肉，自由放歌的游牧，已将这些南来的雁子变成了草原的鹰。确实，在草原，我们已找不到当年的孤儿，遇到的是草原新一代牧民。

（原载 1996 年 12 月 21 日《中国社会报》）

爱在草原

邓晓白

大约每个家庭都会或多或少地拥有一些旧照相簿，翻开它，宛如翻开一段历史。当额尔德穆图将十几张一寸见方的照片逐个排在我面前时，过去的岁月，就仿佛重现眼前。

额尔德穆图，当年内蒙医院小儿科主任。1958 年底，当第一批 300 余名孩子送到锡林郭勒盟后，很快就被牧民们领回了家。秋季的草原已十分寒冷了，加上急于养好孩子的牧民用浓浓的牛奶喂养，许多孩子患上了重感冒和腹泻。这个消息很快报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乌兰夫指示说：将这批孩子先集中起来抚养，等治好病，养壮实后再还给牧民。于是，在 1958 年 10 月，以额尔德穆图主要负责，由内蒙 6 家大医院抽调出 20 余名医生和护士奔赴锡盟。在锡盟温都尔庙建起了一个临时的医疗护理所，幼小或生病的孩子集中在这里治疗抚养。额尔德穆图记得，当时还有一位专门给孩子配营养餐的护士叫王玉兰。医疗队还带去大量棉布，教牧民们怎样包裹孩子。当年卫生厅妇幼保健处处长斯琴老人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们：别看额尔德穆图是个大男人，包孩子可是细心了，又快又好。有许多把孩子送回来的牧民舍不得孩子，便把牛羊托给邻居，自己给医疗队作不要报酬的保育员。有一位叫央金索的大妈，孩子送去后放心不下，便安置好牛羊，锁上蒙古包赶来当了保育员，不当班时也在保育室外转悠，怕自己的孩子出什么事。偶尔她听到一个保育员说孩子拉屎太臭，便跑到附近的商店打听，有什么东西抹上去会香。售货员告诉她雪花膏就行。一辈子不知雪花膏是何物的大妈买回一盒，一定要给孩子擦在屁股上。从 1958 年 10 月到 1959 年 5 月，在锡盟温都尔庙，医疗队将第一批孩子的病全部治好、养壮，送还给了牧民。

1960年2月5日，在内蒙古政府礼堂召开的卫生和新闻四级干部会上，乌兰夫同志再次谈到这批孩子，指示说：要收一个，活一个，壮一个。在财政很困难的情况下，自治区拨出专款100万元人民币，在全区各盟市办起大中型（100床——200床）保育院，并在11个城市医院、37个旗县医院收养了儿童，到1963年，前后共收养儿童近3000名。1960年的元旦和国庆，乌兰夫行程千里，先后到内蒙医院、呼盟、海拉尔视察保育院，给孩子们带去食品和玩具。

30多年过去，孩子们长大了，绝大部分孩子掌握了蒙汉两种语言和文字，一部分孩子接受了高等教育，有的去了美国，有的到了大城市，有的回到草原，当了干部、教师、科技工作者，更多的人成为草原新一代的牧民。但无论他们身在何处，我所采访的每一个人，都会告诉我，他们已是草原之子，像草原绵长醇香的酒，草原的爱已融进了他们的血液中。他们正用智慧和双手，回报这片养育了他们的土地。

（原载1996年12月24日《中国社会报》，有删节）

敖德巴拉：大草原养育的“上海孤儿”

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宋和平

“我很想知道我的亲生父母是谁。”

5月1日中午，刚刚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鄂温克族女强人敖德巴拉在她下榻的内蒙古“工会大厦”对记者表露了这样的心声。早在1995年，她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模范，第一次离开草原到内蒙古自治区计生委作报告时就说过：“我是一名上海孤儿，是内蒙古大草原养育了我，我的荣誉属于草原……”

敖德巴拉现在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温克自治旗锡尼河东苏木人民政府的计划生育助理员，现年38岁。她身着民族服装，讲一口流利的蒙古语。她的肤色、举止无不体现着少数民族的特征。

1959年11月28日，她出生在上海市。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不少孩子沦为孤儿，她也是其中之一。3个月后，她和3000余名南方城市的孤儿一道被送到内蒙古大草原。其中，她和400名小伙伴被送到呼伦贝尔盟人民医院托儿所。在这里，蒙古族阿姨莫得格像对待亲生子女一样精心照料他们。这位阿姨给她取名为“敖德巴拉”，汉语意为“菊花”。一年后，他们被牧民收养，她被鄂温克自治旗锡尼河东苏木罕乌拉嘎查的鄂温克族牧民高力根、南吉勒玛夫妇收养。这对夫妇待她如掌上明珠。

从此，敖德巴拉成了当时全国仅有万余人的鄂温克族家庭的一员。

5岁那年，敖德巴拉的右小腿红肿化脓，诊断结果令全家人大吃一惊：骨结核！医生说：“要想治好病，必须截肢。”她的鄂温克族爸爸妈妈硬是不让医生这样做。他们坚定地说：“一定要为女儿留下双

腿，一定要治好病。”阿爸带她去上海、到北京、进天津……她所在的生产队为帮她治病卖掉了一些牛、羊、马，连他们最心爱、最离不开的雕花马鞍也卖掉了。一晃8年过去了，敖德巴拉是在病床上，在父母的背上、怀里躺着长大的。后来在京、津、沪、哈尔滨等地的名医指点下，在当地“赤脚医生”的精心照料下，敖德巴拉竟奇迹般地站起来了。她没有截肢，而骨结核病却痊愈了。她像一只小鹿在草原上蹦来蹦去，这使全家人喜出望外。随后，她背上书包开始上学读书了。

1979年，她在呼盟海拉尔市第一中学读高二时因患湿症而辍学。回到牧区后，她被招聘为嘎查小学民办教师；次年，她参加了全旗的师资培训，被评为优秀学员，同年转为正式教师。那时，她主要学习蒙古语，对汉语并不精通。1981年，她与达斡尔族小伙子特格喜巴雅尔结了婚，丈夫放牧，妻子教书，小日子过得蛮不错。之后，敖德巴拉因工作出色被调回苏木政府工作，先后担任过食堂厨师、打字员、政府秘书、民政助理、民政会计、卫生助理、妇联干事等。她在每一个岗位上都兢兢业业，干出了成绩，成了闻名全苏木的“拚命三郎”。

1987年3月17日是她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天，她被任命为苏木政府计划生育助理员，走上“天下第一难”的工作岗位，开始了富有传奇色彩的生命里程。

锡尼河东苏木以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居多，汉族仅有250多人；且这里地广人稀，全苏木面积达3500平方公里。在这里开展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和优生优育服务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当时，结婚不登记、生孩子无序、近亲结婚等现象大量存在。

针对此情况，敖德巴拉骑着那匹枣红马“马不停蹄”地宣传计划生育政策，千方百计制止近亲婚育，为育龄妇女开展婚、孕、育等生

殖保健服务工作，历经了千辛万苦。

1993年12月22日，锡尼河东苏木气温零下40多度。敖德巴拉骑着那匹枣红马要深入牧户搞年底人口统计。丈夫特格喜巴雅尔心疼地劝她：“这几天太冷，过一阵子再下去吧！”她说：“不行，年终人口报表必须准时上交，布日都嘎查还有70多户没做统计，我必须马上去。”上午9时许，她顶着寒风出发了。草原天气娃娃脸，说变就变；她刚走出十几里，就下起了大雪。这个苏木的户与户之间少则50里，多则100余里，路被雪埋了，寒风刀子般刮着敖德巴拉的脸，她伏在马背上，把脸埋在马鬃里，但马鬃上很快结了冰，连饥带饿，她被冻麻木了，渐渐迷失了方向，任凭枣红马驮着她走……

老马识途。深夜11时许，枣红马把她驮到一牧民的蒙古包前。牧民达西斯仁为她烧水、做饭，终于将她暖和过来了。但她的耳朵、头皮被冻裂了。次日，她忍着“头痛”，骑着马又向雪原深处走去，一户又一户，整整用了7天时间，才走完70户牧民家，行程超过3000余里。计划生育统计报表填好了，而她的头发因头皮化脓出血而被剃光了！

这样的经历对敖德巴拉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在10年的计划生育工作生涯中，她每年1/3的时间骑着马在嘎查中行走。为做思想工作方便，她从1987年开始努力学习汉语，次年她就能把汉语宣传资料翻译成蒙古语。1995年12月17日，《内蒙古计划生育条例》修订颁布后，她自己把汉语《条例》翻译成蒙古语，用油印机印刷后快速发放到户。“磨破嘴皮、冻裂头皮、踏烂脚皮、饿瘪肚皮”，敖德巴拉在草原深处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

敖德巴拉在当地保持着4项骄人记录：一是“活地图”，全苏木的牧点、营盘的位置尽在她的脑中；二是“活档案”，560多户牧民的家庭状况，比如几口人、男孩女孩等，她都一清二楚；三是“语言

全能”，她会讲汉语、蒙古语、鄂温克语、达斡尔语等 4 种语言；四是“朋友最多”，她先后拿出 500 多元钱为贫困妇女买衣服、粮食、营养品等。凡牧民妇女生孩子，她都要亲自进行护理。大家有知心话找她讲，有悄悄话跟她说，有困难找她帮，她成了妇女的贴心人。

出色的工作、崇高的人格使敖德巴拉所在的苏木政府连续 10 年荣获鄂温克自治旗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一等奖。“三八”红旗手、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这一系列荣誉称号更加鞭策着敖德巴拉全力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她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内蒙古大草原对我的培育之恩。”

敖德巴拉上有父母，下有两个正在读书的孩子。她尽可能地尽孝心，献母心。临别时，她告诉记者：“如果我能找到上海的亲生父母，请他们来草原上与我的养父养母聚一聚，那该多好啊……”

（原载 1995 年 5 月 6 日《周末报》）